

## 第六章 同文之盛：以滿洲字音寫蒙古語文

「同文」一詞在清代各類文獻裡經常出現，民間、官方均不乏事例，<sup>1</sup> 尤其官書典籍裡有關「同文」的言論頗多，強調以「同文之治」為施政目標，清朝盛運的開拓是「同文之盛」的表現。清代的「同文」與前代不同，是不同語文之間的翻譯，充分表現「文以載道」的理念。<sup>2</sup>而這種理念的實踐與滿文、蒙文有密切關係。

清太祖努爾哈齊命額爾德尼等人創製滿文，滿文早期借自蒙古文字，是為老滿文；後來，清太宗皇太極命達海將初期滿文字母，旁置圈點，又新添字母，使滿文的形、音、義更臻完善，是為新滿文。<sup>3</sup>本文所指的「滿文」多是「滿洲字」，即是字母。<sup>4</sup>「音寫」則是以拼音、注音的方式記錄另一種語言文字，也可以說是音譯。乾隆朝廷在整理關外時期的老滿文檔案時，除了照樣重抄，也用當時通行的所謂新滿文「音寫」，即是以新滿文字母為老滿文注音、標音。<sup>5</sup>而至少從康熙朝開始，朝廷便以滿洲字音寫

<sup>1</sup> 民間文書方面，例如：《新刻校正買賣蒙古同文雜字》，這是一部看圖識字的語文工具書，長期在北京、東北一帶為做蒙古買賣者所使用。內有「滿漢同文」一欄，每一個漢字皆用滿洲字注音，另以蒙古文字對照，也輔以圖畫標示器物，參見賈敬顏、朱風合輯，《蒙古譯語、女真譯語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頁193-220。此書的版本情況以及最早於何時等資訊筆者尚不清楚。另外還有《滿漢同文雜字·清字解學士詩》，也是清初滿、漢兩種語文的翻譯，參見中嶋幹起，〈北京圖書館藏「清字解學士詩」の研究〉，《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46-47（1994），頁97-155。

<sup>2</sup>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93-99，根據葉高樹的說明可知：清朝政府在各種字書辭典的纂輯過程中，不斷賦予其同文與大同的文化意義，文字具有「文以載道」的作用，也是重要統治工具，「同文」係指各民族的文字均具備「載道」的能力，只要經由翻譯、比對的方式，便可達到溝通觀念並強化統治的目的，此舉與傳統中原王朝的「書同文」政策有顯著區別。但是清代「同文」的理念從何而來？是如何產生的？還有待考察。

<sup>3</sup> 參見莊吉發，〈文獻足徵—《滿文原檔》與清史研究〉，《清史論集》，第一輯（臺北，民86（1997）），頁39-42。

<sup>4</sup> 滿語裡的字和文是有分別的，文、字在漢語則可以通用。本文所說的滿文，也是指滿洲文字、字母。

<sup>5</sup> 關於不同語文之間的音譯、音寫，仍有討論的空間，例如：相較於日文的情況，日文以「(片)假名」字母拼寫「外來語」的方法，使「外來語」變成日本語文。至於滿洲文字記錄其他語文的例子，除了本文討論的蒙古語文之外，如：《五體清文鑑》，包括了以滿洲字轉寫(transliteration)藏文、維吾爾文(回字)，這是「字符轉寫」；以及記音、注音(transcription)，這是「標音轉寫」，而這二者應都可以用漢語稱做「音寫」、「音譯」。蒙古文字記錄其他語文也有其傳統和方法，例如：喇嘛：blama，拉薩：lhasa，其中的b與h都是把藏文原有的字母成分也保留在蒙文裡，即便它對發音的影響不大，這是蒙古文字對藏文的轉寫(transliteration)，

蒙古語文。

以滿洲字音寫蒙文的文獻頗多，官書、私著均有，表現層面廣大。字書與辭書，即語文工具書所佔數量尤夥。這類的語文工具書不但具有實用性的學習功能，也反映了朝廷的語文政策。本章分析滿文音寫蒙古語文的文獻材料，首先說明音寫蒙文表現的層面廣大，以及蒙古語文持續地豐富滿洲語文，最後討論清朝滿洲政治文化如何表達其「同文」理念。

## 第一節 編纂語文工具書

以滿文音譯、拼寫蒙文的辭書頗多，官修、私著均有，這類的語言工具書不但有實際的學習功用，也反映朝廷的語文政策。首先介紹官修「清文鑑」系列圖書，以其中的《御製滿蒙文鑑》為滿文音譯蒙文的主要代表作。

### 一、「清文鑑系列」

「清文鑑」，滿文寫做：manju (滿洲) gisun (語) i (的) buleku (鏡) bithe (書)，意為滿語的字書，也是字典、辭典，而蒙文也同樣以「鏡」來表示，拼寫做：toli (鏡) bicig (書)，toli 本有字書的意思。<sup>6</sup>另外，做為漢文書名的「通鑑」，具有「以史為鏡」之意，滿文也譯做：hafu (通達) buleku (鏡)，相當有特色。康熙皇帝開始編修《御製清文鑑》以來，又有多次的擴大、改編工程，形成「清文鑑系列」圖書，<sup>7</sup>也是清朝前期滿

---

猶如以羅馬拼音(romanization)轉寫的藏文。滿、蒙、藏、漢文阿禮嘎禮字，則是對梵文咒語的轉寫(transliteration)。關於滿文的羅馬拼音(romanization)的各種討論，可參見 Gertraude Roth Li, *Manchu*, p. 16; 甘德星，〈滿文羅馬字拼寫法芻議〉，《滿學研究》，第六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頁 50-68。最近的研究成果參見：Giovanni Stary, “An unkno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Manchu writing: the Indian Letters(tianzhu zi 天竺字)”,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8:2(2004), pp. 280-291。

<sup>6</sup> 滿文用「鏡」來表達字書、辭典的用法，與蒙古、西藏以及漢文化的關係，待進一步考察。

<sup>7</sup> 「清文鑑系列」指官修的以「清文鑑」為名的各種圖書，而以「清文鑑」為名的尚有其他私著，如：雍正十三年，明鐸著《音漢清文鑑》，乾隆十一年，宗室屯圖撰《一學三貫清文鑑》等，則不在此「清文鑑系列」範圍，但據奉寬指出，《一學三貫清文鑑》是《御製增訂清文鑑》添

洲文化發展的重要指標。

「清文鑑系列」包括：康熙年間所修《御製清文鑑》、《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以及乾隆年間所修《御製滿蒙文鑑》、《御製增訂清文鑑》，此四種是以滿文解釋滿文為體例，可以當作一類。另一類是從《御製清文鑑》所發展的另一條路，乃通過《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發展到了《御製五體清文鑑》，是不同民族語文詞彙的對譯，並以滿文對音、音譯為體例，而這一方向最重要的轉捩點即是《御製清文鑑》的蒙文譯本，尤其又進一步將蒙文以滿文音寫。此後這種看似滿文，實為蒙文的書寫形式便大量出現。

### （一）《御製清文鑑》與《御製增訂清文鑑》<sup>8</sup>

《御製清文鑑》是最早的官修滿文字典，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康熙皇帝唯恐後生之輩漸漢語，忘卻滿語根本，並為注重翻譯人才的培養，乃萌生編纂滿文字書之意。「將滿語照漢文字彙發明，某字應如何用，某字當某處用，集成一書，使有易於後學」，<sup>9</sup>而編纂工作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完成。<sup>10</sup>康熙皇帝的《庭訓格言》也有特別針對《清文鑑》的家訓，表達他珍視本民族語文傳統的心願：

訓曰：我朝清字，各國語音俱可以協，太宗皇帝時，曾借蒙古字以代清文，後來敕諭學士達海，修飾蒙古字，加以圈點，而撰清文。朕慮將來或有授受之訛，故時與高年人等搜輯舊語，製為《清文鑑》頒行之，既有此書，則我朝清字，必不至於遺漏矣。<sup>11</sup>

這是一部滿文單語辭書，分門別類，「為部三十有六，為類二百八十，為書二十一卷」，以滿文解釋滿文，並舉儒家典籍為釋詞例證，也是「清文鑑系列」的首部之作。<sup>12</sup>

---

加漢字音義的先河，也可謂影響了「清文鑑系列」的發展。以上二書內容概況參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6，頁211-213。

<sup>8</sup> 《御製清文鑑》的滿文題名：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御製增訂清文鑑》的滿文題名：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m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sup>9</sup> 《康熙起居注》，冊1，頁93-94，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sup>10</sup> 康熙皇帝序於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御製清文鑑》的編纂過程，可參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頁24-26。

<sup>11</sup> 《庭訓格言》，收入李健注譯，《康熙皇帝告萬民書康熙皇帝教子格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172。

<sup>12</sup> 《御製清文鑑》，滿漢文序文，參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附錄，頁180-186。關於卷數，《御製清文鑑》書凡20卷，〈總綱〉4卷，〈後序〉1卷，合25卷。其中〈總綱〉

《御製增訂清文鑑》是以《御製清文鑑》為基礎「增訂」而成，保留了以滿文解釋滿文的體例。而增訂的內容包括詞彙的擴充、增加漢文音義，尤以滿漢切音為要旨，「每條標著國語，左為漢字，或一字對音，或二合、三合切音，毫髮不爽，其右列漢語，又其右音以國書，俾覽者皆可成誦」，簡言之，即以二個或三個漢字、聲韻字來拼讀滿文，並以漢字的大小來表示標示滿文音節的輕重音。<sup>13</sup> 雖沿襲《御製清文鑑》採用以滿文解釋滿文的釋義方式，但「其注釋並取日用常言，期於人人共曉，不致有拘牽傳會之失」，故將《御製清文鑑》裡原來引自儒家典籍的例句全數刪除。<sup>14</sup>

《御製增訂清文鑑》凡三十二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編總綱〉一卷。〈總綱〉是檢索之用，以滿文字頭順序排列。《御製增訂清文鑑》的編修過程亦是歷時長久，於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二十日進呈起，至三十五年（1770）五月初三日奏完，序於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二十四日。原為滿漢文各為一本，後將滿漢文合為一本繕寫，並照此式樣刊刻。<sup>15</sup>其中切音的工作在乾隆十五年以前已受到重視，並展開多項工作，如《同文韻統》的修纂。

## （二）《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與《御製滿蒙文鑑》、《御製滿蒙文鑑總綱》<sup>16</sup>

### 1. 關於書名

《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與《御製滿蒙文鑑》二書，就滿蒙文題名來看是同一部書，就內容來說《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的蒙文是本字，沒有

為檢字之索引。參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6，頁210。

<sup>13</sup> 這種漢字是一種創新，和《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阿禮嘎禮》同體例，參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6，頁185。

<sup>14</sup> 〈御製增訂清文鑑提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32，頁1。參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161-163。

<sup>15</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6，頁809。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御製序文所署日期為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sup>16</sup> 《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是《御製滿洲、蒙古合璧清文鑑》的簡稱，和《御製滿蒙清文鑑》的滿文題名相同：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前者蒙文題名：qayan-u bičigsen manju mongyol ügen-ü toli bičig，後者蒙文題名是以滿文音譯拼寫的蒙文：hagan nu bicigsen manju monggol ugen nu toli bicig。《御製滿蒙清文鑑總綱》的滿文題名乃加上「總綱」，滿文寫做 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i uheri hešen，滿文拼寫蒙文做 qayan-u bičigsen manju mongyol ügen-ü toli bičigun bugude kelkiye。

異寫，《御製滿蒙文鑑》的蒙文則是以滿文字母拼寫的蒙文，即是音寫蒙文。因為滿蒙文題名相同，內容也只是文字改寫的沿襲關係，是故二書容易混淆。

《御製滿蒙文鑑總綱》的滿文題名和前二書相同，而於每卷卷數前註明「總綱」字樣，<sup>17</sup>雖成書較晚，與《御製滿蒙文鑑》仍為一體。

《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是《御製清文鑑》的滿蒙合璧版本，也沒有漢文譯文，因此《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等三書漢名，是學者及相關目錄所言的一般性通稱。<sup>18</sup>《國朝宮史》著錄該書做「清文合蒙古鑑一部」，<sup>19</sup>因此，「清文合蒙古鑑」有可能是當時該書的漢文題名！另外，《御製滿蒙文鑑》，據袖珍精寫本木製套盒上的刻字：「蒙古清文鑑」所示，也可能是該書的漢文題名。<sup>20</sup>「蒙古清文鑑」之稱保留了「清文鑑」字樣，似比「御製滿蒙文鑑」較合乎「清文鑑系列」的漢文名稱。由於沒有統一的漢譯題名，這三書的登錄資料甚為混淆。<sup>21</sup>以下略述此三書的特色。

## 2. 《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

《御製清文鑑》成書兩年後，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月，康熙皇帝即諭令將《御製清文鑑》譯成蒙文，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方才告竣，<sup>22</sup>前後費時六年有餘，此和康熙皇帝對譯文的謹慎態度有很大的關係。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庚寅日，上諭大學士等曰：

滿字既有《清文鑑》，蒙古字書亦纂輯，著交與教習唐古特書之官員阿爾必特祜、乾清門侍衛拉錫等翻譯，會同蒙古侍讀學士、中書等修成《滿洲蒙古合璧清文鑑》一部，一邊寫滿洲字，一邊寫蒙古字，其引經處俱行裁去。若有伊等不知之處，著問八旗年老通曉蒙古書之人，於朕起行前，酌量繕寫數篇呈覽。<sup>23</sup>

此書將「引經處」刪除，即不收錄摘自儒家的例句，這也是《御製增訂清

<sup>17</sup> 例如：滿文：「uheri hešen. ujui debtelin」漢譯做「總綱，首卷」。

<sup>18</sup> 《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的書名有不同的著錄名稱，也容易與滿蒙文同名的《御製滿蒙清文鑑》相混，參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157-160。

<sup>19</sup> 《國朝宮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卷31，書籍10，字書，頁610。

<sup>20</sup> 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典藏袖珍精寫本《御製滿蒙文鑑》，編號「民01645-01665」，該館電腦著錄做「御滿蒙文鑒」！

<sup>21</sup> 例如：《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頁100。

<sup>22</sup> 翻譯臣工之序文日期為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參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156-159。

<sup>23</sup>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冊4，卷241，頁397，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庚寅。

文鑑》體例之先聲。又據翻譯臣工所述，若遇有不能翻譯的困難之處，則向蒙古八旗耆老和年班來朝的四十九旗扎薩克蒙古、五十七旗喀爾喀扎薩克之蒙古王公、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請教，並以康熙皇帝所裁示為準繩。<sup>24</sup>

《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的流傳甚廣，對京師八旗蒙古學習蒙文尤有裨益，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十三日，內閣侍讀學士舒魯克就曾奏請：

因成書之底版今存於武英殿，請旨敕諭八旗蒙古，若有情願刊印《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之人，呈文該處，備領紙墨租價印刷，於習者之有正導，似有大利。<sup>25</sup>

由此可見此書受到重視的程度，而此奏議也成為下面要介紹的《御製滿蒙文鑑》的編纂動力。

### 3. 《御製滿蒙文鑑》

《御製滿蒙文鑑》是據《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改寫重刻而成，成書於乾隆八年（1743）。本書是將蒙文全面改以滿文字母音譯拼寫。由於多數版本未必附有乾隆八年四月十一日乾隆皇帝的御製序文，而是首列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二十二日《御製清文鑑》的御製序文，和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十一日《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翻譯臣工的序文，也都是採滿文和音譯蒙文合璧形式，因此，容易被誤認是《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sup>26</sup>

乾隆皇帝為《御製滿蒙文鑑》所寫的滿文、音寫蒙文合璧的序文，頗能反映他對蒙古語文的看法以及他承自父祖對蒙古文教提倡的態度，漢文

<sup>24</sup> 翻譯臣工的序文，附於《御製滿蒙文鑑·序》，頁5。

<sup>25</sup>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三十二輯，滿文諭摺，第五輯，頁154-156；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55。此段滿文轉寫：beleni ere bithei undehen ne u ing diyan de bisire be dahame. bairengge. jakūn gūsade hese wasimbufi. cihanggai manju monggo gisun i kancime araha buleku bithe be šuwaselaki sere niyalma bici. harangga bade bithe alibufi. hoošan behe i turigen hūda belheme gamafi šuwaselabure ohode. monggo gisun tacire urse de jingkini jorin bifi ambula tusa gese。

<sup>26</sup> 例如：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圖12「《御製滿洲、蒙古合璧清文鑑》序之一首頁」、圖15「《御製滿蒙文鑑》序首頁」，都是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御製清文鑑》之序文。筆者所見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有《御製滿蒙文鑑》版本數種，其中，袖珍精寫本有序四種：一、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即《御製清文鑑》之序文；二、乾隆八年四月十一日，即此《御製滿蒙文鑑》之序文；三、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即《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翻譯臣工之序文；四、乾隆八年四月十九日，即《御製滿蒙文鑑》承辦臣工之序文。而該館藏已出版的《御製滿蒙文鑑》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720-721，則只有康熙四十七、五十六年的二種序文。

略譯如下：

……彼等各地方之語音殊異，文字不同，因中國滿洲、漢人書同文之治，取改未成，是故設立理藩院，特管辦彼等之事。又興蒙古、唐古特、俄羅斯等官學，教習各部文字。其內之蒙古語文，雖可通於各部，而編寫國史，舉凡頒佈諭旨、奏書、銘刻碑文等大政大典，所用之處甚多，亦關繫緊要，故我神聖祖父聖祖仁皇帝，特意頒旨，將《清文鑑》以蒙古語翻譯刊刻，頒行內外。皇父世宗憲皇帝，又賜恤設立蒙古文試典，勵獎學子。朕躬承先祖之大道，朝乾夕惕，無一時不存心法祖，畏懼而省身，不求安歇，辦理萬務，於暇讀書察理，周詳余意。又一統外藩諸部，懷柔撫治，若不通語音，不解本意，得上下彼此之情，恐不通達。暇時閱覽聖祖仁皇帝《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亦粗知蒙古語音，唯蒙古文但有字畫，而無圈點，不曉語言之人，難於識讀，且初學之人，取音附合，所讀類項不易辨別。思之今八旗蒙古內舊人已少，今若不察明審訂，日久致誤，正字正音相互不得，依此誤而習以成風，後人學時，恐更難矣。特遣臣工將《（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之蒙古字，俱以滿洲字書寫重刻，致識讀為易，此後欲學蒙語之人，仰副聖祖仁皇帝以蒙語譯寫《清文鑑》頒行之至仁、世宗憲皇帝立蒙文試典之重恩、朕尋思教成之意，由此滿洲字畫求蒙古字畫，由此滿洲語音求蒙古語音，可細察悉習，成此而蒙古舊業陳學不致丟失，且於職官奉旨派任外藩各部，部院辦事，撫遠治道皆有益，於改訂文字之政亦稍有裨益。乾隆八年四月十一日。<sup>27</sup>

<sup>27</sup> 《御製滿蒙文鑑》（袖珍精寫本，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序3，頁1-6。滿文轉寫：ese meni meni ba na i gisun mudan encu. bithe hergen adali akū. dulimbai gurun i manju nikan bithe i emu obure dasan be jafafi dasame banjinarakū ofi. tuttu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libufi. ceni baita be cohatoi kadalame icihiyamuha. geli monggo tubet oros i jergi alban tacikū ilibufi. geren aiman i bithe hergen be tacibuhabi. erei dorgide monggo bithe gisun. geren ailman gurun de gemu hafumbuci ombime. gurun i suduri bithe arara. yaya hese be selgiyere. bithe wesimbure. eldengge wehe de foloro jergi amba doru. amba kooli de baitalara ba umesi labdu. holbobuhangge inu. oyonggo ofi. tuttu mini enduringge han mafā šengdzu gosin hūwangdi cohome hese wesimbufi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be monggo gisun i ubaliyambume arafi. folobufi dorgi tulergi de selgiyehe. han ama šidzung temgetulehe hūwangdi. geli kesi isibume monggo bithei simnere kooli ilibufi tacire urse be. huwekiyebume yendebuhe. mini beye mafari i amba doru be alifi. erde kiceme yamji jobome emu erin seme mafari be alhūdara be gūnin de tebuhekūngge akū. tuttu geleme olhome beyebe tuwakiyame yamji cimari ergere be bairakū. tumen baita icihiyaha šolo de bithe be hūlame giyan be kimcime mini gūnin be akūmbuha. geli tulergi geren gurun be uherilefi bilume

乾隆皇帝身體力行學習蒙古語文，業已了解「不曉語言之人，難於識讀」的困擾，進而憂心於蒙文正確的拼寫與語音，將隨著耆老的凋零而無所憑依，頗不利於語文文化的發展。他指出蒙古官學在各種「官方語文」的教學上佔有最重要的地位，舉凡編寫國史、諭旨、奏書、碑文都與蒙文相關，這也是康熙皇帝翻譯《御製清文鑑》的主因。此外，奉旨承辦改寫的臣工有：武英殿督辦和碩和親王弘晝，校對官、寫楷字官員等約四十名，他們也留名為序一篇，序文裡還提到乾隆皇帝熟讀《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二、三月之間，即如本來熟悉，竟至通曉」的情形，<sup>28</sup>可見此書確為內廷學習蒙文的教材。皇子入上書房讀書，「每日功課，入學先學蒙古語二句」，<sup>29</sup>蒙古語文的教學確實存在於清宮。

#### 4. 《御製滿蒙文鑑總綱》

此書是上述《御製滿蒙文鑑》的檢字索引，但卻遲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才完成，晚了三十餘年。全書共八卷八冊，編修名單首列「十二阿哥」（永璿），連同大學士舒赫德、核對官員侍讀學士圖桑阿（Tusangga）、寫楷字官員中書包第（Boodi）等共七人。<sup>30</sup>

dasara de terei gisun mudan be ulhiyakū banin gūnin be sarakū oci. dergi fejirgi gūnin be ishunde bahafi hafumburakū ombi seme. šolo šolo de šengdzu gūsin hūwangdi i araha man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 be tuwame monggo gisun mudan be inu muwašame saha. damu monggo bithe de hergen jijun bisire gojime. tongki fuka akū ofi. gisun ulhirakū urse takara hūlara de mangga bime. tuktan tacire niyalma mudan gaime ici acabume hūlara hacin be ja i ilgama muterakū. ne jakūn gūsai monggoso i dorgi fe urse komso oho. te ci aika getukeleme toktoburakū oci. inenggi goidaha manggi. ulhiyen i tašarabufi jingkini gisun mudan be baharakū. ishunde waka be songkolome tacin banjinafi. amga urse tacire de ele mangga ojarahū seme gūnifi. coohome ambasa hafasa de afabufi man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i monggo hergen be gemu manju hergen i arabufi dasame folobufi takara hūlara de ja obuha. ereci amasi monggo gisun taciki sere urse. šengdzu gosin hūwangdi i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 be ubaliyabume arafi selgiyehe ten i gosin šidzung temgetulehe hūwangdi i monggo bithei simnere kooli ilibuha ujen kesi. mini ere jakanjame gosime hūwašabume tacibure gūnin de acabume ere manju bithei hergen jijun ci monggo bithei hergen jijun be baime. ere manju bithei gisun mudan ci monggo bithei gisun mudan be baime narhūšame kimcime urebume tacici acambi. uttu ohode. monggo i da doro fe tacin burubure waliyabure de isinarakū bime. tušan de afaha hafasa hese be alifi tulergi geren aiman de takūrara. jurgan i baita be icihiyara. goroki be bilume dasara doro de gemu tusa ojoro be dahame. hergen be dasara dasan de inu majige niyececun ombidere. abkai wehiyehe i jakūci aniya duin biyai juwan emu.

<sup>28</sup> 《御製滿蒙文鑑》，序 4，頁 1-8。滿文轉寫做：tumen baita icihiyaha šolo de šengdzu gosin hūwangdi i araha man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 be kemuni jafašame. juwe ilan biyai sidende uthai daci urehe adali. šuwe hafu ulhihe。

<sup>29</sup> （清）福格，《聽雨叢談》，卷 11，〈尚書房〉，頁 219。

<sup>30</sup> 《御製滿蒙文鑑總綱》，卷 8，頁 62。此頁末題寫日期為「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六日」。此版



《御製清文鑑》有〈總綱〉八卷，〈補編總綱〉一卷，「總綱」正是「清文鑑系列」不可或缺的檢字工具。<sup>31</sup>依十二字頭次序分冊編排，如第一冊為「a、e、i起，o、u、ū止」。<sup>32</sup>《御製滿蒙文鑑總綱》特別之處是以蒙文詞彙字頭為次序，不似其他清文鑑以滿文列序。這或許是想改變長期以《御製清文鑑》〈總綱〉來檢索的情況，改以蒙文檢索，而建立不同語文的檢索途徑確有必要。

《御製滿蒙文鑑總綱》亦是滿文與音寫蒙文並列，但只用滿文說明該字詞可見於哪幾類。例如：第一冊，「a、e、i起，o、u、ū止」，表示首頁是a字頭：

「a./ a. : fonjire jabure hacin de bi. bithei hacin de inu bi. jilgan asuki i hacin de inu bi」，<sup>33</sup>漢文意即：「a/a：在問答類，書類、聲響類亦有」；「alin jakaraha. akjan. akjambi. akjan darimbi. galga oho. talmahan./ agūla jabsarlaba. ayungga. ayungga doogarumui. ayungga dagarimbu. arilja. agaljin nu silusu. : ere ninggun giusn. abkai hacin de bi.」，漢文意即：「東方明、雷、雷鳴、電擊、晴了、游絲」，<sup>34</sup>此六語在天文類有；「sukdun./ agūr. : abkai hacin de bi. niyalmai beye hacin de inu bi.」，漢文意即：「氣，在天文類有，在人身類也有」。上述的滿文「talmahan」、「sukdun」都不是「a」字頭，而其蒙文則是「a」字頭，故此總綱是以蒙文的字頭來排列的。

也有學者批評「清文鑑系列」的總綱檢索，「依漢語門類分先後，致清語字系隔別難檢」，<sup>35</sup>也就是說檢索出某字在某類之後，仍必須到某類

本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品，木刻本，該館電腦著錄資料：「滿蒙文鑑總綱八卷，拉錫，乾隆四十一年」等，索書號：「民01760-01767」。其中「拉錫」應是《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的蒙譯纂辦官員，似有誤。

<sup>31</sup> 據奉寬所言，「清語依照十二字頭，檢查字義之書」，有康熙朝《御製清文鑑》、乾隆朝《御製增訂清文鑑》之總綱、補編總綱，及沈啟亮《大清全書》、李廷基《清文彙書》、宗室宜興《清文補彙》，及不著撰人《滿漢同文全書》，參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5，頁682。

<sup>32</sup> 第二冊為na、ne、ni起，kū、gū、hū止；第三冊為ba、be、bi起，šo、šu止；第四冊為da、de起，co、cu止；第五冊為ja、je、ji起，wa、we止；第六冊為ai、ei、ii起，an、en、in止；第七冊為ang、eng、ing起，ab、eb、eb止；第八冊為ab、eb、ib起，dza、dze、dzi等字止。

<sup>33</sup> 「a./ a. :」表示，「/」符號以前為滿文，以後者為音譯的蒙文，二者並列，而「：」冒號以後的文字為解說，以下同此。

<sup>34</sup> 游絲，意為秋霧。

<sup>35</sup>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6，頁56。雍正年間有董佳明鐸氏撰《音漢清文鑑》，將總綱逐字譯以漢語，學者始便。另見冊5，頁683。

裡去查明字義。若又以滿漢兼通的要求考量，《御製清文鑑》等「清文鑑系列」的總綱，都沒有並列漢文，不似李延基於乾隆十六年（1751）撰成《清文彙書》一書，「編次之先後，則依十二字頭」為門類，不將字詞依義歸類，專為檢字之用，<sup>36</sup>是比較接近現代依字母順序排列的辭書。

### （三）《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sup>37</sup>

這部書是滿蒙漢三語音義對照的集大成之作。它的產生有其實用目的，三種語文在行政公務上的重要性，與相關工具書需求的迫切性，自清初以來便一直存在，終於在乾隆時代才有了制度性的改革，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月二十九日，上諭編纂《欽定清漢對音字式》：

向來內外各衙門題奏咨行事，凡遇滿洲蒙古人地名，應譯對漢字者，往往任意書寫，並不合清文蒙古文本音之字，不一而足，因而舛誤鄙俚，甚至以字義之優劣，強為分別軒輊，尤屬可笑，方今海寓，車書大同，《清文鑑》一書屢經更定頒示，且曾編輯《同文韻統》，本三合切音，詳加辨訂，合之字音無銖黍之差，第篇帙較繁，行文或未暇檢閱，昨因評纂《通鑑輯覽》，於《金、遼、元》人地名之訛謬者，悉行改正，復命廷臣，重訂《金、遼、元國語解》，將三史內訛誤字樣，另為刊定以示傳信，而現在疏章案牘，清漢對音轉未畫一，於體制殊為未協，著交軍機大臣，依國書十二字頭酌定對音，兼寫清漢字樣，即行刊成簡明篇目，頒行中外大小衙門。嗣後遇有滿洲蒙古人地名對音，俱查照譯寫，俾各知所遵守，將此通諭知之，欽此。<sup>38</sup>

《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可謂是針對公務而行的實用字書，與其他各種史書的釐定工作同時並進。上述編纂《御製增訂清文鑑》自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至三十五年（1770）五月基本完成，前後費時達二十年之久，可見審

<sup>36</sup>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 6，頁 56。奉寬提到李延基著此《清文彙書》，「實清文鑑總綱之濫觴」，不知其意何指，因其所謂「清文鑑總綱」在康熙四十七年已完成，《清文彙書》成書較晚。

<sup>37</sup> 滿文題名：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nikan hergen ilan hacin i mudan acaha buleku bithe，蒙文題名：qayan-u bičigsen manju mongyol kitad ügen γurban jüil-nü ayalyu neilegsen toli bičig，見於《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4，頁 2。

<sup>38</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 7，頁 18。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又《國朝宮史續編》著錄做乾隆三十八年敕撰並校刊，附錄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諭旨。參見（清）慶桂等編，《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卷 92，書籍 18，字學，頁 902-903

訂切音的工作著實不易，而清廷在數年後認為不能缺少蒙文，乃進一步完成滿蒙漢三語的切音字書。

針對《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的編纂，乾隆四十年（1775）九月，軍機大臣開始將「《三合清文鑑》兼寫各體音釋切音，繕樣呈覽」，<sup>39</sup>成書後，乾隆皇帝作序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十一日，可以說是在《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基礎之上，加入蒙文切音、音譯以及釋義而成，其宗旨和下面要討論的《金元國語解》、《西域同文志》相同，都是為了避免翻譯用詞附會帶有民族歧視意味的漢語。序文有言：「彼其於語言文字中，謬存我是彼非，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面而唾空，終於自污其面哉」，所謂「入者主之，出者奴之」，意指：相同者尊之，相異者賤之，<sup>40</sup>批評的這正是不了解語言音義，一味醜化外族的心態。

《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附有〈凡例〉一篇，共十五條，是其他「清文鑑」所無，與滿洲語文有關者五條，解釋蒙古語如何切音、對音的規則有七條，而首三條為宗旨，頗可了解本書體例樣貌：

一、每滿洲語一句，必兼以蒙古語、漢語，俾閱者因一得三。一、每滿洲語一句，對音以蒙古字、漢字，俾讀者因彼即可識此，蒙古語、漢言亦然。一、滿洲語、蒙古語之音韻，漢字多不能締對，句傍兼寫三合切音字，俾讀者得韻之正。<sup>41</sup>

這是說明，滿蒙漢三語字詞並列，滿蒙文字旁以三合切音的漢字來拼讀，可得音韻正確，滿文之下並列蒙漢文對音，即以蒙文拼寫滿語，又以漢字書寫滿語，此漢字乃用一音節對音一漢字來表達，不是三合切音。蒙文仿此，其下並列滿漢文對音，即以滿文拼寫蒙語，也以漢字拼寫蒙語。此三種語文的對音，還可「按讀法變音書寫」，即寫出「音變」的讀法。總之，本書不止是滿文拼寫蒙語的形式，也有以蒙文拼寫滿語，方便蒙古人學習使用，誠可謂音譯文字的集大成之作。

另有《御製四體清文鑑》、《御製五體清文鑑》的編纂，內容裡的蒙文沒有以滿文音譯，故而在這不做討論，僅於「清文鑑系列一覽表」中略述。

這些「清文鑑系列」圖書，從滿文單語跨出，往多語言發展，展現從康熙朝到乾隆朝，民族、疆域格局的擴大；跨出滿文單語的第一步，即加

<sup>39</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8，頁7。乾隆四十年九月十一日。

<sup>40</sup> 此二句據滿文直譯，滿文轉寫做：adalingge be wesihuleme. encungge be fusihūšarangge。

<sup>41</sup> 《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凡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34，頁27-28。

入蒙文對譯，又以把蒙文改寫成音寫蒙文，便於學習蒙古語文，由此可知，蒙古語文在此系列官書中所扮演的角色確實重要。

表 6-1 清文鑑系列一覽表

書名	成書時間	語文	特徵
御製清文鑑	康熙 47 年	滿	唯一滿文單語字書
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	康熙 56 年	滿、蒙	清文鑑系列開始加入蒙文
御製滿蒙文鑑（蒙古清文鑑）	乾隆 8 年	滿、蒙	全書蒙文以滿文拼寫
御製增訂清文鑑	乾隆 36 年	滿、漢	滿文旁附切音，漢文有滿文對音。
御製滿蒙文鑑總綱	乾隆 41 年	滿、蒙	以蒙文字頭編排檢索
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	乾隆 45 年	滿、蒙、漢	分類字書，有〈凡例〉，沒有〈總綱〉。
御製五體清文鑑	乾隆 56 年	滿、蒙、漢、藏、回	藏文下附滿文轉寫與讀音拼寫二種
御製四體清文鑑	乾隆 59 年	滿、蒙、漢、藏	成書晚於《五體清文鑑》

資料說明：1.「成書時間」以序文日期為主。2.有關《御製五體清文鑑》和《御製四體清文鑑》的成書及特色，參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 165-168。

## 二、《滿蒙漢三體字書》<sup>42</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典藏寫本，是一部有滿、蒙、漢字彙與文法、會話等內容豐富的語文圖書，其詞彙數量雖少於「清文鑑系列」，關於民俗文化的內容，十分具有民族文化交流的特色，而書中對皇家生活的描述，也充分反映此書是滿洲政治文化的產物。目前沒有發現其他抄本、刻本，故可能只保存於宮廷的孤本。

由於沒有序文說明，<sup>43</sup>只能據內部特徵判斷為乾隆八年（1743）左右的作品。<sup>44</sup>若與上述同樣成書於乾隆八年的《御製滿蒙文鑑》（蒙古清文鑑）以及乾隆皇帝自述於乾隆八年始學習蒙古語的時間相配合，此《滿蒙漢三體字書》很可能是乾隆皇帝學習蒙古語文的教材之一。

<sup>42</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冊 722。

<sup>43</sup> 另據《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頁 99、100，所著錄的《滿蒙漢字書》(manju monggo nikan ilan hacin i gisun)，二種版本：一、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精寫本，二十五冊；二、大連市圖書館藏，雍正十三年，舒明阿抄本，一冊，目前不確定這二個版本是否是內容相同的作品。而《滿蒙漢三體字書》的特徵較符合第一種版本。

<sup>44</sup> 在〈語篇類，下〉(gisun meyen i hacin. fejergi.) 裡面，出現「乾隆八年 (abkai wehiyehe i jakūci aniya)」字樣。《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382。

乾隆皇帝對於各種民族語文也勤勉學習，乾隆四十六年（1781）他自己記述如下：

國語自幼習之，六歲習漢書，乾隆八年始習蒙古語。二十五年，平回部遂習回語；四十一年，平兩金川方習番語。昨四十五年，因班禪來謁，兼習唐古忒語，亦能解名物器數而尚弗純熟，未能言達事之始末，然並國語及漢文則已通六處語言矣。使自八年弗習此四處語，則至今尚藉人通譯，不能盡悉其情面，亦無過虛度此數十年，可見諸凡不可自畫而弗勤學也。<sup>45</sup>

此段自述，頗表其勤學心跡。

### （一）字彙

《滿蒙漢三體字書》和《御製清文鑑》的編纂原則相同，也是分類別編排，（類，滿文寫做 *hacin*），但在類別順序和選詞上則不盡相同，且只有少數詞彙特別加注釋文，對照的漢文也和《御製增訂清文鑑》有所出入；雖然分門別類，但不如《御製清文鑑》、《御製增訂清文鑑》有嚴格分為部、類、則的體例，只有類這一項。

該書將某幾類先作一簡要綱目，再按類列出字彙，這些綱目之下並沒有漢文對照。例如，首頁列出了五類綱目：「*dorolon i hacin*」，禮儀類（禮部）<sup>46</sup>，「*dufe sirke i hacin*」，淫黷類（人部七），「*omin yuyun i hacin*」，飢饉類（人部四），「*tantara forire hacin*」，捶打類（政部），「*habšara duilere hacin*」，詞訟類（政部）。以上次序先後並無關聯，這些類目裡《御製清文鑑》裡，則分別屬於禮部、人部、政部。<sup>47</sup>

在詞訟類字彙之後，第二批類目也有五種：「*jilgan asuki i hacin*」，聲響類（人部五），「*aibire hukšere hacin*」，腫脹類（人部七），「*ucarara tunggalara hacin*」，遇合類（人部六），「*sogi booha i hacin*」，菜肴類（食物部），「*dedure amgara hacin*」，睡臥類（人部五），以上次序彼此也

<sup>45</sup> 《御製詩四集》，卷 80，頁 1，〈古希〉，「龍乘不息法一健，象譯由來通六音」之詩注。另外，可見於《御製詩四集》，卷 84，頁 22，〈雜詠〉，「癸亥學談蒙古語，回番唐古遞通多」，詩注與引文相近；《御製詩五集》，卷 35，頁 35，〈上元鐙詞〉，「弗藉舌人通譯語」，詩注：「乾隆八年，始習蒙古語」。《御製詩四集》，卷 80，頁 1，〈古希〉，「龍乘不息法一健，象譯由來通六音」之詩注。另外，於《御製詩五集》，卷 35，頁 35，〈上元鐙詞〉，「弗藉舌人通譯語」詩注：「乾隆八年，始習蒙古語」。

<sup>46</sup> 括號內的「禮部」，是指此「禮儀類」在《御製清文鑑》裡繫於「禮部」項內，以下同。

<sup>47</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1。漢文則據《御製增訂清文鑑》。

無關聯。<sup>48</sup>

某些多義字彙附有釋文。上述《御製清文鑑》等書編纂目的在於以滿文解釋滿文字彙，而《滿蒙漢三體字書》也有些詞彙是附有解釋的，針對多義字略做說明，並且和《御製清文鑑》等釋文未必相同。此以〈遇合類·使會見(ucara tunggalara hacin·acabumbi)〉為例。<sup>49</sup>

表 6-2 《滿蒙漢三體字書·遇合類·使會見》與其他詞書比對一覽表

滿蒙漢三體字書 acabumbi	御製增訂清文鑑			御製清文鑑、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	御製滿蒙文鑑
漢譯	漢譯	所屬部類	總綱		
無此字義	迎合	人部七，讒諂類	卷 1，頁 5。 acabumbi	無此字義 <sup>50</sup>	無此字義
無此字義	合盞	禮部，筵宴類		無此字義	
使會見	使會見	人部六，遇合類		有此字義	有此字義
合籠	合	產業部二，趕押類		有此字義	
合意	合	人部四，喜樂類		有此字義	無此字義
配對	配對	營造部，營造類	卷 3，頁 38。 duwali acabumbi	有此字義	

資料說明：1.「御製清文鑑、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為康熙年間所編纂，僅滿文本和滿蒙合璧本的差別，故同作為一欄，此參考《二十一卷本辭典》，該書是《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的蒙文部分，1977年，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2.「總綱」是《御製增訂清文鑑總綱》，以字頭編排，每字詞下說明該字收入於哪幾類，以便於檢索。

〈遇合類·使會見〉的釋文裡，對 acabumbi 這個多義字的四個詞義的解說，有漢字注於旁，分別是：「使會見、合籠、合意、配對」，相較之下，《御製增訂清文鑑》所收入的字義最多。在釋義和檢索方面，《滿蒙漢三體字書》和《御製清文鑑》相同，所收入的「合籠」是指將不同物件放在同一處，「合意」是指事情及於已想的，此二字義在《御製增訂清文鑑》裡都漢譯做「合」，且這些字分見於《御製增訂清文鑑》的三個部類，除非透過《御製增訂清文鑑總綱》按字頭檢索才能查到，因為分類辭書只能提供該字詞在某一類項裡的意義，而不能提供多義字的各種解釋。例如。「配合」滿文拼做 duwali acabumbi，在檢索《御製增訂清文鑑總綱》時，必須從 duwali，而不是 acabumbi，因此容易遺漏。是故《滿蒙漢三體字書》在選辭及解義的數量雖不如《御製增訂清文鑑》，但從多義字的說明及漢譯對照的角度來使用，則頗為方便清楚。

<sup>48</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7。

<sup>49</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13。

<sup>50</sup> 只有收入 acabuki，意為迎合的（人），亦收入於《御製增訂清文鑑》。

## (二) 用滿文寫的蒙文文法

以下分別介紹本書的文法部分，每篇的標題都用滿文書寫，蒙文也用滿文音寫，而且沒有漢譯，做為當時兩種語文翻譯用之教材，共八段。

### 1. 蒙文十二字頭的疑問語氣<sup>51</sup>

此篇介紹蒙文疑問句的表達方法，除了按十二字頭的順序，介紹不同的字頭所接的疑問詞之外，還有例句說明。以下漢譯第一段：

在阿字頭裡，詰問於人的蒙語，整字添加 yao、yeo、jio 之後說出。若是連字，添加 bao、beo、nao、neo。例如，對人說：這是你的牲畜嗎？這是定價嗎？那件事是那樣嗎？即是整字的疑問語氣。對人說：你上奏了嗎？你說了嗎？你要上奏嗎？你要說嗎？就是連字的疑問語氣。此字頭所有的一切問話整字、連字，若按此添加後，即成為疑問語氣。<sup>52</sup>

從漢譯內容來看，我們可能還不能了解蒙文疑問語氣的表現方法，且若只看滿文內容可能也是不夠的，因為滿文的疑問句只是在句末附加一個字母「o」，連寫即可，這裡的滿文例句也都如是書寫。滿文、蒙文例句基本上是二種語言對照翻譯，只不過此篇蒙文是用滿文音譯。

簡言之，蒙文字彙可以加上疑問詞，來表示疑問語氣，而疑問詞所上接的字彙，屬於蒙文阿(a)字頭的字彙有：unay-a(坐騎)、ün-e(價格)、ailadqaqu(上奏)、geleku(訴說)，後接的疑問詞可分為整字、連字二類，即獨立的疑問詞(整字)，和附加連寫的疑問詞(連字)二種形態，亦即：unay-a 後接 yum uu。本篇的蒙文是以滿文音譯拼寫的，以滿文音譯蒙文「讀音」，unay-a yum uu 則寫做 una yao。ün-e yum uu 同樣以滿文音譯蒙文讀音，寫做 ūne yeo。這也就是上譯漢引文裡的 yao、yeo。而動詞 ailadqaqu

<sup>51</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185-189。滿文轉寫：moggo juwan juwe uju i fonjire mudan。

<sup>52</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185-186，滿文轉寫：a i uju de bisire niyalma de fonjire monggo gisun. gulhun hergen oci. yao yeo jio seme nonggifi gisurembi. holboho hergen oci bao beo nao neo seme nonggifi gisurembi. duibuleci niyalma de ere sini ulaho. ere toktohuha hūdao. tere baita tuttu seme gisureci uthai gulhun hergen i fonjire mudan inu niyalma de erebe si wesimbuheo. alahao. wesimbumbio. alambio seme gisureci uthai holboho hergen i fonjire mudan inu. ere uju de bisire eiten fonjire gulhun hergen ocibe holboho hergen ocibe ere songkoi nonggifi gisureci uthai fonjire mudan ombi. 其中的 uan 是反映口語讀音，以滿文拼寫的是讀音，蒙文拼做 unay-a，意為坐騎、役畜。ūne 亦是以滿文拼寫蒙語，蒙文寫做 ün-e，意為價格。而特別的是，這裡的滿文 ū 的寫法，在右邊均多寫一個「點」，並不是規範的滿文母音字母。也許是為了拼寫蒙文而創造的滿文字母，值得與其他辭書做比較。

的過去時形態 *ailadqaba*，附加上 *uu* 連寫之，再以滿文音譯蒙文讀音，就寫做 *ailadhabao*，也可說是字根 *ailadha* 加上 *bao*，同理，*kelebeo*，是 *kele* 加上 *beo* 的連寫。而現在未來時形態則表現為 *ailadqana* 加上 *uu*，讀做 *ailadhanao*，同理，*kelenao* 是 *kele* 加上 *nao* 的表現。

### 2. *ese*、*ūlu*、*ūgei*（否定形式）的使用<sup>53</sup>

這篇是關於動詞否定形式的用法，*ese*、*ūlu*、*ūgei* 是滿文音譯的蒙文，蒙文原寫做：*ese*、*ūlü*、*ūgei*。整段內容漢譯如下：

*ese*、*ūlu*、*ūgei* 三個字都是一樣的用語時，把 *ese*、*ūlu* 放在（字）上面，把 *ūgei* 放在（字）下面，*ese* 是遇上滿文 *hekū*、*hakū*、*rakū* 時使用，*ūlu*、*ūgei* 是遇上滿文 *rakū* 時使用。例如，對人說：「這事情是已辦成了呀，怎麼沒有上報，沒有告訴一聲？你若不報，我就要報。」即是 *ese* 的用法。「因此，那個人所報告的話，這件事並非我單獨管的，管的人實在眾多，你們都不做，要我怎麼辦！」即是 *ūlu*、*ūgei* 字的用法。<sup>54</sup>

例句裡的「沒有上報」、「沒有告訴一聲」，*ūlu* 放在字前，*ūgei* 放在字後，音譯蒙文與蒙文本字對照：*ese ailadqaba/ ailadqaysan ūgei*、*ese sonosqaba/ sonosqaysan ūgei*；「若不報」，蒙文寫做：*ese ailadqabala*；「不做」蒙文寫做：*ūlü boloqu/ boloqu ūgei*。

### 3. 蒙語 *dagan*、*degen* 等字（向位格）的使用<sup>55</sup>

這篇是關於向位格的用法，滿文音譯蒙文寫做：*dagan*、*degen*、*dur*、*tur*，滿文的向位格只用「*de*」一字，蒙文則變化較多，本篇有原則說明以及例句，其中說明的部分頗為詳細，漢譯如下：

蒙語的 *dagan*、*degen*、*dur*、*tur*，是一樣的用語，都是遇到滿文 *de*

<sup>53</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191，滿文轉寫：*ese ūlu ūgei be baitalara hacin.*。

<sup>54</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191，滿文轉寫：*ese ūlu ūgei sere ilan hergen gemu emu adali gisun baitalara de ese ūlu be dele dosimbumbi. ūgei be fejile dosimbumbi. ese be manju hergen i hekū hakū rakūci de teisulebume baitalambi. ūlu ūgei be manju hergen i rakū teisulebume baitalambi. duibuleci niyalma de ere baita serengge icihiyame šanggaha baita kai. ainu wesimbuhekū donjibuhakū. si wesimburakūci bi wesimbumbi seme gisurerengge. uthai ese sere hergen be baitalarangge inu. ede tere niyalmai karu alara gisun. ere baita umai mini emhun kadalhangge waka. kadalara niyalma umesi geren ce gemu ojurakū bade mimbe aina seme gisurerengge uthai ūlu ūgei sere hergen be baitalarangge inu.*。

<sup>55</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192-193，滿文轉寫：*monggo gisun i dagan degen i jergi hergen be baitalara hacin.*。



時使用。使用時，分別陽性字、陰性字，按十二字頭的語音，施用 dagan、degen、tagan、tegen，dagan、tagan 放在陽性字下面，degen、tegen 放在陰性字下面。又在書（面語）裡面，dagan、degen、tagan、tegen 是向尊貴的人有感情的語氣，dur、tur 是和對平常人說話一樣的語氣。dagan、degen 等字，平常說話時，要說成 dan、den、tan、ten。<sup>56</sup>

#### 4.（滿文）de、be 的使用<sup>57</sup>

此篇是列出各種滿文「虛字」，即文法裡附加成分的用法，包括：de、be、fi、me、i、kini、ni，並對照蒙文的表現形式以及讀音，這些包括蒙文名詞的向位格（degen、du、tu）、賓格（gi）、所有格（yin、u）、副動詞（ju、γad、n、mayča）、祈使式（tuγai）及疑問詞（aji）等。

#### 5. 分開（蒙文）陽字、陰字、隨陰隨陽字<sup>58</sup>

此篇說明蒙文強調字的陽、陰、中性性質，滿文分別寫做：a、e、siden，蒙文則寫做：a、e、ersü。蒙文母音 a、o、u，是陽性字母，e、ö、ü 是陰性字母，而 i 則是可以和陰性陽性字搭配的中性字，這裡稱作「隨陰隨陽」！

#### 6.（蒙文）iyer、ber（憑借格）的使用<sup>59</sup>

此篇說明蒙文憑借格的用法，由於滿文的所有格、憑借格都以「i」來表示，<sup>60</sup>因此此篇以滿文 i 的例句，對照蒙文的用法，以便於學習。

#### 7. 製作奶皮子等物類<sup>61</sup>

這篇以滿蒙文合璧的形式，介紹各種奶皮子等相關食品的作法，這些奶製品是蒙古族的日常生活食品，不但種類多，有奶皮子、乾奶皮子、奶

<sup>56</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192，滿文轉寫：monggo gisun i dagan degen dur tur serengge emu adali gisun gemu manju hergen i de sere hergen de teisulebume baitalambi. baitalara de a e be ilgabume juwan juwe uju i mudan be dahame dagan degen tagan tehen seme dosimbume baitalambi. dagan tagan be a hergen i fejile dosimbumbi. degen tehen be e hergen i fejile dosimbumbi. jai nomun i doro de dagan degen tagan tehen be wesihun niyalma baru gisurere dosholoro hajilara mudan sembi. dur tur be an i niyalma baru gisurere gese sasa mudan sembi. dagan tehen i jergi hergen be an gisurere de dan den tan ten seme gisurembi.。

<sup>57</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194-195，滿文轉寫：de be i baitalara hacin.。

<sup>58</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196-197，滿文轉寫：a e siden i hergen be faksalara hacin.。

<sup>59</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198-199，滿文轉寫：ieyr ber baitalara hacin.。

<sup>60</sup> 有時亦有用「ni」的情況。

<sup>61</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200-205。滿文轉寫：oromo i jergi jaka be weilere hacin.，奶皮子在本篇裡滿文均寫做 oromo，而在《御製增訂清文鑑》等辭書寫做 oromu。

豆腐等，還可放入餡料，做成各式節日糕餅，所敘述的內容比起《御製增訂清文鑑》只是解詞而言要詳細許多。另一特色是，此篇的蒙文並不是以滿文音寫，也是全書唯一一篇「真正」的蒙文。下面舉一段為例，漢譯如下：

取奶皮子：把奶煮得滾沸，裝進盆裡一直揚著，水泡出來後，蓋上布，使奶皮子結皮，冷了後，取出奶皮子。把奶少許一併取出的，叫做稀奶皮子。<sup>62</sup>做乾奶皮子：在奶裡放入少許的江米，煮沸，結皮後取出，把二片合在一起曬，乾了後，抹上糖水，在火上烤。結熱奶皮子：把奶煮得滾沸，揚一揚，泡沫出來後，蓋上布，結皮了，趁熱取出後，夾棗泥。在奶皮子裡放山楂泥包起來，放水果餡，放豆沙餡，<sup>63</sup>放棗泥餡，把芝麻研磨成泥後放進。

正月十五日，在奶皮子裡放山楂泥，做元宵；二月初二日，做奶皮子煎餅；五月初五日，在奶皮子裡放棗泥，做粽子；八月十五日，在奶皮子裡放山楂泥，做月餅；九月初九日，在奶皮子裡放各樣的果泥，做重陽糕。<sup>64</sup>

上述關於奶皮子的做法頗為詳細，而《御製增訂清文鑑》裡的說明則較簡單，漢譯做：煮沸的奶的表面，結成皮浮起的，稱為奶皮子。<sup>65</sup>

<sup>62</sup> 「稀奶皮子」，滿文寫做：unda oromo，其中 unda 意為脊背，或許應做 undan，意為薄冰。對照蒙文，二行並列寫做：jögelen/ singge öröm-e，意為軟的、稀的奶皮子。

<sup>63</sup> 「豆沙泥」，滿文寫做：deng ša do，deng ša 或許即是豆沙，蒙文寫做：burčay-un qoliča idege，意即豆子混合的餡子。

<sup>64</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200-201，滿文轉寫：oromo gaire de. sun be fuyebume fuifufi fengse de debumbi. samarahai obonggi tucike manggi. wadan dasime oromo orobumbi. šahūrun oho manggi. oromo gaimbi. sun be majige suwaliyame gaihangge be unda oromo sembi. fiyakūha oromo weilere de sun de giyangmi bele be majige dosimbufi fuifumbi. oroko manggi. tucibufi. juwe farsi be emu bade kamcifi walgiyambi. olhoho manggi šatan i muke ijume tuwa de fiyakūme weilembi. halhūn oromo orobure de. sun be fuyebume fuifufi samarambi. obongge tucike manggi. fadan dasifi oroko manggi. halhūn be amacame gaiḡi soro i šugi hafirame weilembi. oromo de umpu šugi sindafi uhume weilembi. tubihe do sindame weilembi. deng ša do sindame soro i šugi do sindame weilembi. malanggū be nijarafi do sindame weilembi. aniya biyai hacin inenggi oromo de umpu šugi do sindame niolhun efen weilembi. juwe biyai jempin inenggi oromo jempin weilembi. sunja biyai sunjanga inenggi oromo de umpu šugi do sindame lala juhe efen weilembi. jakūn biyai biyanga inenggi oromo de umpu šugi sindame biyanga efen weilembi. uyun biyai uyungge inenggi oromo de hacingga tubihe do be sindame uyungge efen weilembi. 。

<sup>65</sup> 《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27，頁 36，滿文轉寫：fuifuha sun i oilo orome dekderengge be oromu sembi. 。

8. 滿文 haran 的蒙語例句<sup>66</sup>

滿文 haran 是一個後置詞，意為：之故、因由、緣由，此篇是介紹蒙文的表現方法。依滿蒙十二字頭，各舉二例句說明。例如，阿字頭(a i uju.)：  
滿文：hafirabuha be aitubure danarangge halhūn gūnin i haran.

(滿文漢譯：救急者，熱心之故。)

音寫蒙文：cihūldaksan ni aburahū ūmulere odokci ni halagūn sanagan naiki.  
滿文：baita be weilere de sain ehe adali akū ojongge taciha erdemu bengen i hacin.

(滿文漢譯：做事時好壞不同者，才學本事之故。)

音寫蒙文：kerek gi kikui du sain magū adali ūgei bolokci ni suruksan erdem tengke neiki.

(三) 語條類<sup>67</sup>

這是一篇短文，以君臣間的談話形式，提及過新年的心情、活動，多是和蒙古有關。《御製清文鑑》、《御製增訂清文鑑》有「言論類」一項，<sup>68</sup>但也只是字彙，並沒有像這一篇談話文章的類項，因此顯得相當特別。此類分上下二篇，此列舉上篇前幾段，漢譯如下：

從過年以來，天氣全是無風又很溫和，看這樣子是上天恩賜，想是又要下一二場雪吧。若是下雪，不但對內地的田地好，即使是你們蒙古草原也有利。看來你們喀爾喀、厄魯特、內扎薩克各蒙古的蒙古語雖相同，但各部語音有異，這是各地方水土之故。今天是一個好日子，以家禮賞賜飯食。你們看到喜歡的就吃個飽吧，你們添些吃吧，飽了嗎？我不會說蒙古語才要學著說，想來，容易學吧。我這說的有個樣子嗎？你們能喝的話，喝！這是酒！怕什麼！你們帶來的布庫裡面有好的嗎？今天準備好帶來你們的善撲人（布庫）了嗎？讓善撲人（布庫）出來，幾個人摔跤還有多的。<sup>69</sup>

<sup>66</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311-312，滿文轉寫：haran sere monggo gisun be duibuleme gisurerengge。

<sup>67</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361-384，滿文轉寫：gisun meyen i hacin。「meyen」滿文意為編、篇章等，此據（清）智信撰，《清文百條》(tanggū meyen)（意為「一百篇」），譯做「語條類」。

<sup>68</sup> 「言論類」，滿文轉寫：gisun leolen i hacin，收入「人部五」。

<sup>69</sup> 《滿蒙漢三體字書》，頁 361-363，滿文轉寫：aniya araha ci ebsi. abka fuhali edun su akū bime umesi nesuken. ere muru be tuwame ohode. abka kesi isibume ainci geli emu juwe mudan nimarambi dere. aikabade nimiraci dorgi b i ursin de sain sere anggala. uthai suweni monggo talai niyanciha de inu tusa. tuwaci suweni kalka ūlet dorgi jasask i geren monggoi gisun udu adali bicibe. meni meni

以上內容應是皇帝與蒙古王公等的談話，提及了新年對瑞雪降臨的期待，以及對蒙語的概括認識、學習蒙語的態度，以及招集布庫摔跤的節目，其他相關內容還有不少。因此《滿蒙漢三體字書》不但有分類字彙，也有短文可以閱讀，從內容來看又多是聯絡滿蒙情誼的節慶活動，也是宮廷生活的描寫。

總之，《滿蒙漢三體字書》以滿蒙詞彙、文法的匯通為編纂要旨，可能參考了《御製清文鑑》、《御製增訂清文鑑》，擇其要點，附以滿蒙文法解說，並收入了若干《御製清文鑑》沒有的辭彙，也因而保留了《御製滿蒙文鑑》沒有收入的蒙文譯文。

### 三、富俊的志業

富俊，字秀升，號松巖，卓特氏，蒙古正黃旗人。由繙譯進士，授禮部主事，累遷內閣學士、兵部、盛京工部侍郎、理藩部、工部尚書、副都統、都統等職，後以內大臣卒，贈太子太傅，諡文誠。著有《三合便覽》、《清文指要》、《蒙文指要》、《三合語錄》<sup>70</sup>、《蒙古托忒彙集》等書，父子二代致力於滿蒙譯學的發揚，對後來學人裨益甚多。<sup>71</sup>

#### （一）《三合便覽》

以滿文拼寫蒙文的字書，除了官方所編《御製滿蒙清文鑑》、《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的分類體例之外，富俊所撰《三合便覽》是採用新的編纂體例，以十二字頭字母順序編排。這雖不是富俊首創，乃是繼康熙年間沈啟亮《大清全書》<sup>72</sup>、乾隆年間李延基撰《清文彙書》<sup>73</sup>之

aiman i gisun i mudan encu. ere inu meni meni ba na i muke boihon i haran. enenggi emu sain inenggi. suwende cohome booi doroi erin buda šangnafi ulebumbi. suwe cihangga be tuwame ebitele jefu. suwe nonggifi jefu. ebiheo. bi monggorome bahanarakū. teni tacime gisurembi. gūnici tacire de ja tere. meni ere gisurerengge muru bio. suweni gajihā buku i dorgide sain bio. enenggi suweni buku sebe belheme gajihao. buku sebe tucibu. udu niyalma jafunuha. kemuni udu funcehe. °

<sup>70</sup> 此書不同版本所題蒙文譯者不同，有富俊以及德勒克、巴赫，將於「六、會話讀本」內介紹。

<sup>71</sup>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5，頁497。

<sup>72</sup>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6，頁55。《大清全書》，沈啟亮撰，共十四卷，序於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就國書字母為綱維，彙集各種清語，勒成此編，全書依十二字頭為次，凡a、ai、an、ang、ao五母純音者居前，ar、ak、as、at、ab、al、am七母複音者居後，每一字部則依字系之先後為次，輔助字、外字、各繫於同類字下，其體例實開《清文鑑總綱》、《清文彙書》等之先河，……後乎此之《清文鑑總綱》、《清文彙書》、《三合便覽》等書胥不能脫

後一脈相承，然而以滿文爲綱，大規模地釐定滿蒙漢三語，用以學習翻譯、溝通文法爲主旨的編纂，則是富俊首創。

該書以滿文拼寫蒙文的特色，不但於滿文譯作蒙文有用，且如同富俊所言：「既易得蒙古書之本體與蒙古語之本義，而尤易得蒙古語之本音」，即是對於蒙文的形、音、義的了解也有幫助。該書的序文由滿蒙漢三語合璧，頗能說明撰寫的要旨，漢文內容如下：

《三合便覽》一書，先大夫敬齋公所手輯也。蓋蒙古書與國書不同，國書有圈有點，不難開卷了解，蒙古書既無圈點可別，而其中更有書此讀彼，及同音異寫等字，使人易致混淆，初習蒙古文者恆苦之。先大夫當未第時，即立意輯成是書，以取便家塾，第有志而未逮。歲戊辰成進士，授理藩院主政，兼軍機處行走，案牘勞形，益無暇及。迨庚辰年恭膺命督理殺虎口驛務，公餘多暇，乃獲從事於是書。是書行分四格，首冠以國書，次漢語，次蒙古語，末則以清書書蒙古語，如蒙古語 tngri，清書則書 tenggeri 之類，使閱是書者，既易得蒙古書之本體與蒙古語之本義，而尤易得蒙古語之本音，其次序即依十二字頭，而每字頭之中又自為次序之，以故卷帙雖繁，而檢閱頗易，立法最為盡善，越寒暑而書成，名曰三合便覽，誌其實也，亦從其質也。

惟是先大夫口差甫竣事，既出牧廣德，嗣調六安，旋又署理潁州郡篆，地衝政繁，不遑復理是書，新語多所未備，今年春，余小子不自量，偕二三友人，依例增補，繕寫成帙，以終先大夫未竟之志，而供同學者採擇焉，因并紀是書之顛末於簡端云。乾隆歲次庚子仲春穀旦，秀升富俊謹識於紹衣堂。<sup>74</sup>

由上可知，由於子承父志，富俊在公務之餘始終不忘撰書，以利學人。乾隆十三年（1748），富俊考取進士，授理藩院主政，兼軍機處行走，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任殺虎口驛務，才有餘暇編書。最後，該書成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鐫板於五十七年（1792），共九卷，續編二卷。後人對該書的評價頗高，指出其價值：「內地學習蒙古語言，輯有專書之

其窠臼，加惠後人，功不可沒。」

<sup>73</sup>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6，頁56。《清文彙書》，李廷基撰，「書凡十二卷，乾隆十六年刊行之，專在清語檢字，實《清文鑑總綱》之濫觴，體例一本《大清全書》，惟所收清語倍蓰過之。」

<sup>74</sup> 《三合便覽·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故滿 000551-000562。另參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6，頁69。

始，加惠士林，厥功偉矣。」<sup>75</sup>

## （二）《蒙文指要》

在刊刻《三合便覽》之時，富俊又撰寫《清文指要》、《蒙文指要》二篇合刊，其宗旨可見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發刊時，首頁附有啓事一則：

是書參訂閱二十餘年，寒暑行役，未嘗稍輟，其間音或襲謬，字或沿訛，淺見寡聞，無所就正，公諸同志，惟冀匡釐不逮，俾免貽誤後人。卷端附以指要，蓋恐有志之士，無力延師，存此以當一隅之舉。秀升富俊謹白。<sup>76</sup>

富俊此二編主要目的還是在於普及教育。爲了不讓清寒學子，因沒有教師指導而不能理解滿蒙文的語法及滿文譯作蒙文的要點，因而寫下這二篇《指要》，用以自習文法、繙譯，其中《蒙文指要》可謂是讀《三合便覽》之「階梯」。<sup>77</sup>

《蒙文指要》的內容，先列出蒙文十二字頭，<sup>78</sup>再介紹蒙古虛字（格助詞）的名稱，並有讀音、格助詞用法等重點說明。其中「蒙古虛字之名稱，悉以清字標音」，介紹六個「虛字」的讀法，也是一種特色，其他詞書中似不多見。<sup>79</sup>例如：yin erebe heisburi sembi.意爲：把這個 yin 叫做 heisburi。這裡的 yin 是蒙文文法所有格的一種。

後人對《蒙文指要》評價也說明了此書的地位：「有清一代，內地講習蒙古繙譯，運用助語之書，此爲創作，飲水思源，亟應表章者也。」<sup>80</sup>

## （三）《蒙古托忒字彙》<sup>81</sup>

<sup>75</sup>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6，頁70。

<sup>76</sup> 《三合便覽》，封面。另參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6，頁72。

<sup>77</sup>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6，頁72、74。

<sup>78</sup>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6，頁74，「以滿洲字作蒙古字之綱領，首蒙古字頭，即所謂 čayan toloyai，察罕托羅蓋也」。

<sup>79</sup> 《蒙文指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圖書館藏。另有：-a erebe caculga sembi，un erebe kongsil sembi，ud erebe turken kongsil sembi，u erebe kungkur sembi，uu erebe urtu kungkur sembi，i erebe kingkir sembi。

<sup>80</sup>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6，頁74。

<sup>81</sup> 《蒙古托忒字彙》，滿文書名：monggo tot hergen i acamjaha isabun，蒙古書名：mongyol tod üsüg-iyar neileldügülügen čüylaly-a。《蒙古托忒字彙》只有內府藏稿本，並未刊行，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藍晒本。

「托忒」，滿蒙文意指「明白」，托忒蒙文是流行於衛拉特蒙古的一種蒙文，為十七世紀中葉咱雅班第達所創制，這一套蒙文拼音字母使蒙文的讀音更加清楚明白。《蒙古托忒字彙》是富俊繼《三合便覽》之後，又一字書巨著。該書序文以滿、蒙、漢、托忒四體合璧形式，頗能知其撰著緣由，漢文內容如下：

稽古六書之作，原有諧聲、假借、轉注諸法，而其義要歸於同，故曰同文。清書蒙文，字體少別，而大略相仿，前以清文繁博，間遇舊語新話，初學未能遍記，一時查對無門，爰成先大夫志，輯《三合便覽》一書，集新舊諸清語，以十二字頭次序排纂，俾翻簡者瞭如指掌。迨己亥歲，富俊成蒙古進士，授禮部額外主事，多有餘暇，因憶蒙文尤夥，查考不易，遂將蒙文亦依十二字頭，次序羅列成編，聊供採擇。惟蒙文中有種托忒字，本係準噶爾厄魯特之文，自我朝平定準噶爾後，餘黨部落投誠，分駐伊犁、科布多等處，定以朝覲班次，恆有文牒往來，辯者較少。乾隆四十七年，軍機大臣奏請在京設立托忒學，蒙古八旗各置學生一名，使之肄業，童而習之，獲以儲才待用，制甚善也。丙辰春，富俊奉命參贊科布多事務，寒清政簡，不敢怠荒，嘗於公餘訪求善曉托忒字體之人，偕與考論，依式摹繕，恐後學遽難口熟，首列蒙文，次以清文釋音，次托忒字，次清語，而以漢字居末，遞分五格，層層印證，閱歲告成，蓋蒙文字無圈點，非口授不能得其音。托忒者即蒙古語明白二字也，因以蒙古托忒彙集名編，從事於斯者，展卷易知，不無裨益云爾，易為序。嘉慶丁巳孟春，崧巖富俊書。<sup>82</sup>

由上可知，富俊撰成此書的過程，以及托忒文字在清代的意義。乾隆四十四年（1779），富俊成為蒙古進士，開始構思編纂蒙文字書，後來朝廷重視對厄魯特蒙古的管理，成立「托忒學」。嘉慶元年（1796），富俊任官於科布多，使他更有機會和通曉托忒文字之人接觸，也產生了在蒙文字書裡加入托忒蒙文的想法。該書「首列蒙文，次以清文釋音，次托忒字，次清語，而以漢字居末」的編排，四種語文重譯相通，又以蒙文十二字頭排列，便於檢索，真可謂「空前大作」。

#### 四、其他字書

<sup>82</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藍晒本，另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5，頁497、498。

### （一）《滿蒙維三體字書》

根據著錄資料所載，本書的蒙文、維吾爾文均用滿文字母拼寫。<sup>83</sup>

### （二）《五種語言詞匯集》

據書影資料，本書題名僅以滿文書寫做：manju monggo tanggūt jarung hūse sunja hacin i gisun，意為：滿洲、蒙古、唐古忒、嘉絨、回子五種語言。<sup>84</sup>全書如題名所示，是五種語言的字書，而都以滿洲字來音寫。其中的嘉絨語係嘉絨族的語言，嘉絨族是指藏族的一支，當地在清代以大、小金川著稱。

此書的編纂或許與清代大、小金川之役，以及乾隆皇帝對當地語言的興趣有關，他同樣在詩句中提到自己學習該語言的時間是在乾隆四十一年（1782）：「平兩金川，略習番語」。<sup>85</sup>這部字匯集的內容有短句，也有單詞。此書與上述的《滿蒙漢三體字書》、《滿蒙維三體字書》都是內府所用，反映乾隆皇帝對語文學習的重視。

### （三）《西域同文志》

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朝平定準噶爾，二十四年（1759）進剿回部，清朝乃將西域新疆收入版圖。照例本應有「方略」之書，但「準語、回文非纂輯文臣所曉」，必須先解決這個大問題，才能編纂史書。此新疆以準部、回部的語言為普遍，西北地區準噶爾部是蒙古族的一支，語言和其他蒙古也不盡相同，因此，先編纂此人名地名詞彙對照的工具書以為綱領。其編排體例如序文所言：

以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準部、回部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繼以對音漢文，復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為準語，或為回語，於是兀格蟀自之言，不須譯鞞象寄，而凡識漢字

<sup>83</sup> 《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頁 100，滿文寫做：manju monggo hoise ilan hacin i gisun。

<sup>84</sup> 《五種語言詞匯集》，收入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圖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版圖 319「五種語言詞匯集」，頁 347。而《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則著錄做《五體字書》，頁 117，但是這裡並沒有註明其滿文音譯的特色，而且本書實際上只有「一體」即滿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共三百餘頁，八帙二匣。據「版圖說明」指出，這部書出現了嘉絨語，是清代詞書所僅見，頁 407。

<sup>85</sup> 《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御製詩五集》，卷 35，乾隆五十三年，〈上元鐙詞〉，頁 35。



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指掌，書既成，名之曰《欽定西域同文志》。<sup>86</sup>

由上可知，不論語源是來自何部族，都先以滿文音譯拼寫，再以漢字音譯，漢字音譯下詳註語源，字義，接著以漢字三合切音、蒙、藏、托忒、回諸部族的文字拼音，順序排列，共有六種文字，蔚為大觀。總之，是以滿文為對音的準繩，做為譯寫其他民族文字語音的樞紐。

表 6-3 音寫蒙古語文圖書目錄一覽表

書名	語文 (由左而右、由上而下)	作者 (譯者)	時代	特徵	資料出處 (典藏單位)
滿蒙漢三體字書	滿、蒙、漢	不詳	乾隆 8 年以後	分類字書，少數字彙有釋文，含文法等。	北京故宮
滿蒙維三體字書	滿、蒙、維	不詳	不詳	不詳	《全國滿文》
御製滿蒙文鑑	滿、蒙	官修	乾隆 8 年	蒙文詞彙、釋文全部以滿文音寫。	北京故宮
御製滿蒙文鑑總綱	滿、蒙	官修	乾隆 41 年	前書的檢字索引	北京故宮
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	滿、蒙、漢	官修	乾隆 45 年	分類字書	《四庫全書》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	滿、漢	官修	乾隆 46 年	分門與原史不同	《四庫全書》
三合便覽	滿、蒙、漢	富俊	乾隆 45 年	十二字頭排列	臺北故宮
蒙文指要	滿、蒙	富俊	乾隆 45 年	附於三合便覽之內	臺北故宮
蒙古托忒彙集	滿、蒙、托特、漢	富俊	嘉慶 2 年	十二字頭排列	北京故宮
滿漢會話	滿、漢、蒙	不詳	不詳	目前僅見辭彙對照	《遼寧圖書館》
西域同文志	滿、漢、蒙、藏、托忒、回	官修	乾隆 28 年	按地區人名地名分門	《四庫全書》
五種語言詞彙集	滿、蒙、藏、嘉、回	官修	乾隆年間	蒙文等全部以滿文音寫	北京故宮
三合語錄	滿、漢、蒙	智信等	乾隆年間	原著為《清文百條》	《遼寧圖書館》
滿蒙漢三合松窗破悶	滿、漢、蒙	不詳	乾隆年間	蒙文以硃筆書寫，夾注於滿漢文之間；書名為後人取義稱之。	《續修四庫》
滿蒙漢話條二十五段	滿、漢、蒙	不詳	乾隆年間		
滿蒙漢話條五十四段	滿、漢、蒙	不詳	乾隆年間		
滿蒙漢話條七十五段	滿、漢、蒙	不詳	乾隆年間		

資料說明：1. 此表包括第二節所討論的會話讀本；2. 「資料出處」以略語表示，「北京故宮」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臺北故宮」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四庫全書》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全國滿文》為《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遼寧圖書館》為《遼寧省圖書館滿文古籍綜錄》，《續修四庫》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3. 「年代」以序文所題日期為準。

由表 6-3 可約略了解音寫蒙文圖書的豐富樣貌，包括：頗能表現政治文化特色的「清文鑑系列」官書；內府用書直接表達乾隆皇帝的重視；富

<sup>86</sup> 〈欽定西域同文志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5，頁 1。

俊所編撰的旗人語文教材，則反映蒙古旗人對於滿蒙兩種語文的熟悉度，除了佔有優勢，也有更高的自我要求。而似乎流傳於旗人社會的各種會話讀本與釐訂史書錯誤的對音改正工程，可視為音寫蒙文的應用表現，於下繼續討論。

## 第二節 音寫蒙古語文的應用

就目前所見資料，自康熙朝以來有關音寫蒙文的情況，並非只是為了編寫辭書的學習以及聲韻切音等官方學術目的，而是用來充分發揮滿洲政治文化的特色。文獻中也出現了由於蒙文書面語與口語有一段差距，而以滿文記錄蒙文口語的情況。

### 一、王致誠《十駿馬圖冊》

#### (一) 《十駿圖》

所謂的《十駿圖》乃是十匹駿馬的畫像，為每匹駿馬做畫一幅軸。《十駿圖》有二套，形成時間不同，收錄於《石渠寶笈初編》及《石渠寶笈續編》，並分別收貯於御書房和寧壽宮。<sup>87</sup>因此，或以「前十駿圖」、「後十駿圖」，或以「御書房十駿圖」、「寧壽宮十駿圖」之名來加以區別。這二十匹駿馬是乾隆年間由各部蒙古王公、台吉等進呈至宮中，成為乾隆皇帝鍾愛的座騎。

「前十駿圖」由郎世寧獨立完成，十駿馬分別命名為：奔霄驄、赤花鷹、雪點雕、霹靂驥、籟雲駛、萬吉驪、鬪虎騮、獅子玉、自在驪、英驪子。「後十駿圖」由郎世寧和艾啟蒙合繪而成，其中有三駿出自郎世寧之手：紅玉座、如意驄、大宛騮；另七駿出自艾啟蒙之手：馴吉騮、錦雲騮、踣鐵騮、佶閑騮、勝吉驄、寶吉騮、良吉黃。<sup>88</sup>

<sup>87</sup> 參見向斯，《書香故宮》，頁125。

<sup>88</sup> 這二十幅駿馬圖的館藏情形，臺北故宮典藏：郎世寧八幅、艾啟蒙三幅。郎世寧所繪「前十駿圖」的奔霄驄、籟雲駛、霹靂驥、赤花鷹、雪點雕，及其「後十駿圖」的紅玉座、大宛騮、如意驄；艾啟蒙所繪「後十駿圖」的踣鐵騮、寶吉騮、良吉黃。其他應典藏於北京故宮博物

## (二)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與郎世寧所繪「前十駿圖」駿馬相較，神態十分相似，是同樣的十匹馬，但《十駿馬圖冊》另以國畫裡的山水景緻為背景，有可能是臨摹郎世寧的畫作而成的。據清人胡據所著《國朝院畫錄》，書中著錄了王致誠的畫冊，其十駿馬之名與「前十駿圖」相同。<sup>89</sup>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更有一項特點，即是駿馬名字的書寫方法，與郎世寧、艾啟蒙的前、後《十駿圖》不同。前、後《十駿圖》以滿、蒙、漢三體文字書寫其名，而王致誠的畫冊只單寫一種，正是以滿文音譯拼寫的蒙文。此種表現方法十分特殊，不但用滿文來拼寫，且只保留蒙文形容詞的部分。郎世寧「前十駿圖」與王致誠《十駿馬圖冊》的命名比較，參見下表：

表 6-4 郎世寧「前十駿圖」與王致誠《十駿馬圖冊》命名比較一覽表

郎世寧「前十駿圖」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
漢文	滿文(漢譯)	蒙文	音寫蒙文
赤花鷹	cakiri giyahūn keire alha (蘆花鷹棗騮花馬)	tarlang qarčayai keger alqa	tarlang harcagai
雪點雕	saksaha daimin cabdara alha (接白雕銀鬃花馬)	čayčayai bürgüd čabidar alqa	cagcahai burgut
霹靂驥	hūdun giyahūn fulgiyan suru (快速如鷹的紅白馬)	hurdu qarčayai sirjol	hūrdun harcagai
箭雲駛	kuri daimin keire alha (虎斑雕棗騮花馬)	qurudu bürgüd keger alqa	hūrutu burgut
奔霄驄	akdun arsalan fulan (結實如獅的青馬)	batu arslan boro	batu arsalan
*萬吉驕			tumen belegtu
*闕虎驕			bar batur
*自在驕			tumen jilgal
*英驥子			itegeltu ider nacin
*獅子玉			has arsalan

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廷繪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郎世寧畫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莊吉發，〈策馬長城外—蒙古滿洲的馬政〉，《清史拾遺》，頁149-156。

資料說明：1.\*表示尚未見到該圖軸的出版圖錄，因此不解其滿蒙文命名情況，此據《十駿馬圖冊》之音譯蒙文推測漢文命名。2.在蒙文命名裡有若干拼寫法與現代不同，如：「快速，qurudu」，《御製五體清文鑑》，寫做 quruudu，現代蒙文寫作 qurdu。「白脊標的，tarlang」，現代蒙文寫作 tarlan。

上表裡的後五駿馬，滿蒙文空白處，乃因目前沒有「前十駿圖」的圖版資

院：郎世寧五幅、艾啟蒙四幅。郎世寧所繪「前十駿圖」的萬吉驕、闕處驕、獅子玉、自在驕、英驥子；艾啟蒙所繪「後十駿圖」的馴吉驕、錦雲驕、佶閑驕、勝吉驕。

<sup>89</sup> 引自聶崇正，〈清代宮廷畫家雜談〉，《宮廷藝術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叢》(臺北：東大圖書，民85(1996))，頁110。

料可以參考，暫缺。對應於《十駿馬圖冊》所示的讀音，可知亦是蒙古語音，觀其文字又是滿文，與前五圖形式相同。例如，「獅子玉，has arsalan」的「has」意為蒙古語「玉」，蒙文拼寫作「qas」，以滿文拼寫即成為同音的「has」。

### （三）廓爾喀貢馬的命名

上述音寫蒙文的形式，在乾隆朝末年時則出現命名上的滿蒙文混用情形。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月，廓爾喀使臣所進獻的貢品中，有地方特產的大象、名馬。大象命名為「馴遠象」、「伏柔象」，駿馬命名為「紫雲騃」、「鳳臆騃」，均以滿漢合璧形式書寫其名。<sup>90</sup>此二馬的滿文名字只以形容詞為名，所謂「紫雲」和「鳳臆」都是形容詞，而漢文裡「騃」和「騃」，並沒有相應地譯出滿文。

「紫雲騃」滿文寫作：jaksangga（霞紅豔的、紫的） seberi（銀蹄） belegtu（有吉兆的），意為有紫紅色銀蹄的吉祥駿馬；「鳳臆騃」滿文寫做：cekjehun（胸膛高） giratungga（骨骼粗壯） belegtu（有吉兆的），意為：形高骨壯的吉祥駿馬。

其中的「belegtu」並非滿文，而是來自蒙文 beleg，意為「禮物、獻禮」，形容詞寫做 belgetü，也有祥瑞的意思。滿文亦借用此字，寫做 belektu。前表中的《十駿馬圖冊》之「萬吉驪，tumen belektu」已見該字的使用，當時是以滿文拼寫蒙文。廓爾喀此二貢馬的滿文命名，也選用 belegtu 一詞，似乎表示已把此字從蒙文借成滿文來使用，成為馬匹詞彙之一。乾隆前期的「後十駿圖」裡，蒙文「有吉兆的，belegtü」一詞，滿文多相應地譯做 sabingga，<sup>91</sup>到了乾隆末年，已直接使用滿文 belegtu，這也是滿文借入蒙文以擴充本身詞彙的明顯事例。

## 二、《筳吹樂章》蒙古曲名

以《筳吹樂章》版本之一，黃摺寫本，其中〈君馬黃〉一曲譜為例：

<sup>90</sup> 「賀清泰、潘廷章：廓爾喀貢馬象圖（卷）」，見（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廷繪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202。

<sup>91</sup> 目前筆者所見的「後十駿圖」，有「馴吉驪」、「寶吉驪」、「勝吉驪」、「良吉黃」，均為艾啟蒙之畫作，亦有滿、蒙、漢三體合璧的命名，漢文「吉」字，蒙文均寫做 belegtü，滿文均寫做 sabingga。

〈君馬黃〉，滿文拼作：kūlan joran，意即：黑鬃黃馬大走，蒙文原來拼作：qula jiroγ-a，滿、蒙文二者詞義相似，滿文詞彙乃是借自蒙文。黃摺寫本滿文不變仍拼作：kūlan joran，而蒙文部分則改用滿文來拼寫成，改 qula jiroγ-a 為 kūlan joro，即以滿文拼寫蒙語讀音。<sup>92</sup>

### 三、蒙古地名

在清代滿文文書檔案裡，遇到書寫蒙古地名時，除了該地以漢語、滿語起名之外，常見的情況是以當地的蒙語發音，再以滿文記下，甚而再音譯或意譯為漢文。以康熙朝滿文《起居注冊》為例，康熙皇帝北巡蒙古地方時，行經路線及駐蹕地點的地名，頗可反映這種現象，舉例如下表：

表 6-5 康熙朝滿文《起居注冊》滿文音譯蒙文地名對照一覽表

滿文本地名	滿文本注	蒙文辭彙部分	蒙文詞義	漢文本譯名	日期、出處
sirga sekiyen i ba		siry-a	黃毛的	黃陂原	康熙 50 年 8 月/ 滿文：史語所稿本、故宮定本，漢文：故宮定本
burgasutai		burysun-tai	有柳的	柳林	康熙 50 年 9 月/ 滿文：史語所稿本、故宮定本，漢文：故宮定本
burgasu hoton		burysun	柳樹	布爾噶圖城	
gahaitu	野豬川	yaqai-tu	有豬的	野豬川	康熙 52 年 8 月 19、20、21、23 日/ 滿文：史語所稿本、故宮定本，漢文：故宮定本
cilootu	石山	čilayu-tu	有石頭的	石山	
ulan halha	紅門	ulayan qalqay-a	紅色，屏障	紅門	
hurhire bira	潺河	kürkir-e	瀑布、咆哮	潺流河岸	
dolon noor miyoo	七溪	doloy-a nayur	七，湖、池	七溪廟	
dergi hoigan		qoiγ	半島、沙洲	德爾機輝罕	
kermutei		keremü-tei	有松鼠的	克勒母台	

資料說明：1.本表「出處」部分，「滿文」為《起居注冊》滿文本，又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稿本，以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定本二種，「漢文」為《起居注冊》漢文本，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定本、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定本二種。2.「滿文本注」是指加在「滿文本」滿文地名旁的漢字注文，並非每個地名都有注文。3.「蒙文詞彙」是「滿文本地名」內原為蒙古語文的辭彙。4.「漢文本譯名」是《起居注冊》漢文本內據滿文本所意譯或音譯成的。

以上滿文地名，其詞彙頗有特色，有的純是蒙語，有的是滿蒙語的合成，例如：滿文 gahaitu，是蒙文 yaqai，豬，加上 -tu，成為 yaqaitu，意為「有豬的」。burgasutai，是蒙文 burysun，柳，加上 -tai 而成，意為「有柳的」，而漢文本《起居注冊》則譯作「柳林」。至於滿文 burgasu hoton，是「柳」加上 hoton 而成，滿蒙文 hoton 均意指城市，意為有柳樹的城市，而漢文

<sup>92</sup> 參見第三章，掇爾多密。

本《起居注冊》則以音譯的方法，譯做「布爾噶圖城」。sirga sekiyen i ba，是滿蒙文合成的地名，其中 sirga，來自蒙文 siry-a，意為亮鬃草黃毛的（馬毛色）、米黃毛的（山羊的毛色），而 sekiyen（源） i（的） ba（地方），則為滿文，漢文乃譯做「黃陂原」。

又如乾隆朝所繪《皇輿全圖》（一般稱做「內府輿圖、內府輿地圖、十三排圖」），地圖上以滿文書寫的地名，記錄的多是蒙古語。<sup>93</sup>蒙古地區地名的字義及如何在文獻裡呈現，音寫蒙文地名似為一重要階段，而這也為地名學的考察提示了方向。

#### 四、考訂正史的工具與產物

為更正誤譯之訛傳而編製的字書種類尤多，有《欽定同文韻統》、《御製繙譯名義集正訛》<sup>94</sup>等，與這些成果同樣是清廷所重視的，則從《金史》開始改定了多部史書，最後又以《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成書，是故，此書可謂是改譯三史的最後成果，而在修纂的過程中又是譯改其他史著的工具書。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清朝政府把握滿文拼音功能的特點，在文化政策的推動之下，除了編纂字書，更又進一步利用滿文注解、考釋《遼史》、《金史》、《元史》，滿文成為改譯三史的利器。纂輯《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的目的，即以滿語拼寫出重新考釋所得的語意，不但擴充原正史所附〈國語解〉的內容與規模，並且更訂體例，另編成書。並且為保持正史體例，「乃改譯漢文，譯其國語之訛誤者，至於其國制度之理亂，君臣之得失，未嘗一字易」。<sup>95</sup>

從滿文書名的字面解釋，或許更能了解所謂的「國語解」的意義，例如：《金、元國語解》，滿文譯做：aisin gurun yuwan gurun i nikan hergen i suduri i gisun be acabume tuwanchiyafi suhe bithe，漢文意即：「把金元

<sup>93</sup> 佐藤長等，〈學問の思い出—佐藤長博士を圍んで〉，《東方學》，第百七輯（2004），頁27。

<sup>94</sup> 《御製繙譯名義集正訛》，序於乾隆三十二年春中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品，木刻本，20帙（一函），索書號「nc/1776/3313.2」。該序文另見《西域圖志校注》，頁295。此書僅是檢較譯改宋代普潤大師法雲所撰《翻譯名義集》而作，並非將《翻譯名義集》全書改譯成滿蒙漢藏四體，且一般滿文目錄圖書多著錄做《御製翻譯名義集》，而缺漏「正訛」二字。

<sup>95</sup> 〈聖製改譯遼金元三史序〉，《國朝宮史續編》，卷92，書籍18，字學，頁904。

朝漢字史書的語言，核對撥正而解的書」。<sup>96</sup>因此，《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已不是原正史所附〈國語解〉，而是針對漢文正史裡的文章，改譯解譯的新著。

乾隆朝廷所改譯的多部史書，至少從乾隆十二年（1747）便開始關注《金史·國語解》，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完成《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為止，歷經漫長時間，除此三部正史之外，尚有《欽定重訂契丹國志》<sup>97</sup>、《欽定重訂大金國志》<sup>98</sup>等等。譯改文字的工作從字書擴及史書，滿文音寫的蒙文也就出現於史書之中。重新考訂所得原語又不限於蒙文，故而產生了以滿文拼寫了索倫語、唐古特（藏）語、梵語等情況。總之，譯改三史的依據主要還是當時認知的滿語、蒙古語，誠可謂在「參漢酌金」之外，「參金酌蒙古」更是實際情況！

### （一） 乾隆朝譯改《遼》、《金》、《元》三史

順治元年（1644），清廷即翻譯《遼》、《金》、《元》三史，對於人名、地名等多按漢字字面，音譯成滿文，如《金史》裡「完顏」，部族名，寫做 wan yan；「僕幹」，河名，寫做 pu g'en；「耶懶」，部族名，寫做 yelan；《遼史》裡契丹國始祖「奇首」，寫做 ci sio；太祖「阿保機」，寫做 abooji；「撻馬狝沙里」，職官名，寫做 tama zung sali；對太祖的讚稱「阿主沙里」，則寫做 ajusali。《元史》裡蒙古國始祖「勃端叉爾」，寫做 bodancar，這些都明顯反映出滿文是從漢文字面直接音譯而來，<sup>99</sup>而以上各詞在乾隆時代則重新考訂原語原義，加以譯改。

乾隆皇帝對漢人以夷夏民族偏見影響史著撰述，甚感不以為然，他表示「彼其於語言文字中，謬存我是彼非，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而唾空，終於自污其面哉」，「雖然予以為亦無足深怪作金元史者之譫文，

<sup>96</sup> 引自《御製三合切音清文鑑·御製序》，滿蒙漢合璧，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一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34，頁8-9。另外可見於光緒十六年新鐫《初學必讀》，書類，頁27，所收錄的《金元國語解》，滿文寫做：aisin gurun yuwan gurun i gisun i suhe，以及《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頁163，《遼寧省圖書館滿文古籍圖書綜錄》，頁223，所著錄的《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滿文寫做：dai liyoo aisin dai yuwan ere ilan gurun i suduri de bisire gisun be suhe bithe，此譯名應是編者補譯的。

<sup>97</sup> 《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28，〈譯改國語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383，頁797-803。

<sup>98</sup>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41，〈譯改國語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383，頁1057-1064。

<sup>99</sup> 參見崔鶴根，〈金史對〉，《語學論攷》，頁108-109；崔鶴根，《滿文《大遼國史》》（：大學校出版部，1971），頁6-8；崔鶴根，〈「蒙古史資料」「蒙古源流」對〉，《語學論攷》，頁438。

何則，彼一類之人，尚有越人視秦人肥瘠之言，而況非其類者乎，又況彼實不解其語言音義乎」，<sup>100</sup>「甚至以字義之優劣，強為分別軒輊，尤屬可笑」，<sup>101</sup>這便是他譯改史書的出發點。

## （二）從《金史》著手

《金史》是乾隆四年，由武英殿校刊，但是《金史》裡的〈國語解〉則是乾隆十二年（1747）才刊行，乾隆十二年三月，「二十一史刻成」以後，乾隆皇帝便陸續提出他對《遼》、《金》、《元》三史的意見。<sup>102</sup>乾隆皇帝於乾隆三十七年回憶說道：先前於乾隆十三年，已進行《同文韻統》，「協以三合切音，令其會意諧聲不相淆混，復因評史，推闡及之」，是故詳晰《遼》、《金》、《元》三史，修纂《國語解》。<sup>103</sup>然而《金史語解》的修纂事實上又早了一年，據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內閣奉上諭：

近因校閱《金史》，見所附〈國語解〉一篇，其中訛舛甚多，金源即滿洲，其官制人名用本朝語譯之，歷歷可見，但大金全盛時，索倫、蒙古亦皆所服屬，幅員遼廣，語音本各不同，而當時惟以國語為重，於漢文音義，未嘗校正畫一，至元臣纂修，又不過沿襲紀載舊文，無暇一一校正，即如所解之中，或聲近而字未恰合，或語似而文有增損，至於姓氏惟當對音，而竟有譯為漢姓者，今既灼見其謬，豈可置之不論，爰命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尚書阿克敦、侍郎舒赫德，用國語校定切音，詳為辯正，令讀史者咸知金時國語本音本義，訛謬為之一洗，並注清文，以便考證。<sup>104</sup>

這裡首先指出了原〈國語解〉的缺失因果緣由，又因認同金和滿洲同源的立場，使得乾隆皇帝對上述缺點特別不能忍受。乾隆十二年，立即把原〈國語解〉仍照原來類目改譯音義。<sup>105</sup>另外，也指示了以滿語對金朝國語校定

<sup>100</sup> 《御製滿蒙漢三合切音清文鑑·御製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28，頁8-10。

<sup>101</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7，頁18，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內閣奉上諭。

<sup>102</sup> 《金史》，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本，藝文印書館；何冠彪，〈論清高宗之重修遼、金、元三史〉，《故宮學術季刊》，12：3，頁49-66。

<sup>103</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6，頁868，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

<sup>104</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2，頁191、192，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內閣奉上諭。

<sup>105</sup> 此於乾隆十二年譯改的《金史·國語解》的情況，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5，頁732-733。提要著錄「〈欽定國語解一卷〉，《金史》附刻本」，是為內府校刊本《金史》附刻之〈欽定國語解滿漢合璧〉一篇，分做五門，體例與乾隆四十六年所敕纂的《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不同。



切音，並加注當代滿文，因此規範了《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基本方法。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的內容，不只有考訂後的滿文原文或音寫，也有漢文的切音。而關於漢文切音的要求，乾隆皇帝也在閱讀漢文本《金史》時，深深感嘆漢字對音於滿文時的漫無章法，隨借記注的混亂情況，豈是修史應有的態度。復鑑於金朝「當時惟以國語爲重，於漢文音義，未嘗校正畫一」，意即當時朝政的缺失，帶給日後修史者過多「自由想像」的空間，並不利於傳信。是故，文書裡凡有遇滿漢文字對音，用字規範甚爲重要，前所述的《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和《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都是這方面成果。

關於漢字對音的規定，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

漢人初學清字者，辨字審音，每借漢字音註，以便記誦，而漢字不能悉協，不得已各從俗音，以意牽合，未經校正畫一，將恐久而益差。間嘗讀漢字《金史》，其用漢字音註國語者，本音幾不可曉諦，尋之則原清語所常習。……蓋由以漢字而註清語、蒙古語，既非本字，又無一定，是以訛復傳訛，以此知官為較定之不可以已也。……蓋凡物之命名本屬後起，爾雅釋名方言土訓，莫可殫悉，皆假象耳，若夫以漢字註清文，實假象中之假象，而必執此以較是非定高下，寓褒貶，此特私心妄見耳。……重定十二字頭音訓。開章（第一字頭）六字用直音，如阿、額、伊、鄂、烏、諤，……其餘十一字頭，首六字用二字合音，……以下俱用三字合音，……以分輕重緩急，而國書之元聲，略可得梗概，是不過同文之一端，無關奧義。<sup>106</sup>

此再次指出「漢字《金史》」的缺失，而爲了破除漢字所造成的「假象中之假象」，不僅考訂出字面的意義，也進一步把音譯滿文所使用的漢字符符合對音的規範，因此有「重定十二字頭音訓」的工作。<sup>107</sup>

架構方面，《金史·國語解》原分成：官稱、人事、物象、物類、姓氏五門，後來與《遼》、《元》二史同時譯改時，變更體例成書，包含：君名、部族、地理、職官、姓氏、人名等。

《金史》裡不只是金代女真人的語彙待改，也有爲數甚多的蒙古語有待審訂。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中旬，軍機大臣奏稱：

臣等遵旨查得《金國語解》卷二內，所有蒙古語對音，原係詢問通

<sup>106</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2，頁451-452，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

<sup>107</sup> 「十二字頭音訓」，當時似乎沒有繕寫成書，至乾隆三十七年始刊行《欽定清漢對音字式》。

曉蒙古語之喇嘛丹巴，<sup>108</sup>就其所知恭擬譯改。臣等隨將卷內原譯字音逐一詳詢現在來京之喀爾喀、厄魯特王公等，據稱比對伊等蒙古土音內，有相近之處，亦有並未知曉者。臣等謹將伊等所未曉各語詳細審核，再行譯對，另纂其所稱音相近之處，並行對準字音改定，一併粘簽聲明進呈，伏候欽定謹奏。<sup>109</sup>

乾隆三十五年距離乾隆十二年（1747）議修之始，已有二十三年之久。可見，釐訂《金史·國語解》的蒙古語彙，乾隆四十七（1782）年成書之前仍不斷修改，經過廣泛的徵詢與討論。

### （三）譯改原則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依據「以索倫語正遼史」、「以滿洲語正金史」、「以蒙古語正元史」的原則，做為考訂原語的大方向，<sup>110</sup>在纂辦過程裡，乾隆皇帝就表現態度積極，曾說道：

凡索倫、蒙古之隸臣僕，供宿衛者，朕皆得親為諮訪，於其言語音聲，皆能一一稽考，無纖微之。……就遼、金、元史〈國語解〉內，人、地、職名、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數，詳晰釐正，每條兼系以國書，證以三合切韻，俾一字一音，咸歸吻合，並為分類箋釋，各依本來意義，以次進呈，朕為親加裁定，期於折衷，至是一訂舊史之踳駁。

111

每一條語詞都用滿文書寫，目的在於以滿文為媒介，合於切韻，而重新釐定合韻之漢字，終可改正舊史譯名雜亂的現象。成書後，內容即可以看到滿文、漢文對音、漢文三合切音，以及註釋。

### （四）譯改過程

乾隆三十五年（1770）八月，將《遼》、《金》、《元》三史與《通鑑輯覽》對照，檢出不符之處，留待改定。<sup>112</sup>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

<sup>108</sup> 「喇嘛丹巴」，藏語：bla-ma-dam-pa，乃對上師的敬稱，意為師尊。

<sup>109</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5，頁39-40，乾隆三十五年二月無日。

<sup>110</sup>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96，頁1，〈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提要〉。

<sup>111</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6，頁868，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

<sup>112</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6，頁335，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軍機大臣奏。此時軍機大臣遵照乾隆皇帝之指示：「至《通鑑輯覽》內，人地名不相符者，併遵旨此時無庸改刊，統於《金、遼、元國語解》序文內敘明，應俟全書告成，臣等再行聲請御製序文刊發」。相較於後來修成的《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則只有提要一篇，並無御製序文。

月，《金國語解》共計十二卷，已進前十卷，卷十一已繕寫裝潢，卷十二底本已辦得，預計於下月初即可完畢，而《遼、元國語解》也已在纂辦底本，俟《金國語解》完竣即可陸續進呈。<sup>113</sup>至三十六年十二月，《金國語解》已訂正完成，即開始將《金史》校勘改正。《遼史》、《元史》亦於其《國語解》修竣後，等同辦理。<sup>114</sup>在乾隆三十五、三十六年的譯改過程中，多稱做《金元史國語解》。<sup>115</sup>

至於《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可謂是上述修纂過程的總成果，官方記載該書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奉敕撰，<sup>116</sup>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二月十七日，已纂辦全竣，進行繕寫刊刻。<sup>117</sup>

表 6-6 以若干順治三年滿文譯本《金史》、《遼史》詞彙為例，說明《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譯改詞彙的情況：

表 6-6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譯改例詞一覽表

漢文本原文	順治三年 滿譯本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			
		滿文詞目	漢文對音	釋文大意	資料出處
完顏	wan yan	wanggiya	完顏	從史，原文。	《欽定金史語解》，卷7，人名，頁1。
僕幹	pu g'en	burhan	布爾罕	蒙古語，burqan，佛也。	同上，卷3，地理，頁1。
耶懶	yelan	jalan	扎蘭	（滿洲語），世代也。	同上，卷2，部族，頁2；卷3，地理，頁1。
奇首	ci sio	kišan (han)	奇善（汗）	滿洲語，鮮明也。	《欽定遼史語解》，卷1，君名，頁1。
阿保機	abooji	amba giyan	安巴堅	滿洲語，安巴，大也，堅，理也。	同上，頁2。
撻馬狝沙里	tama zung sali	tamaga sait	塔瑪噶賽特	蒙古語，塔瑪噶，tamay-a，印也；賽特，said，大臣也。	同上，卷5，職官，頁1。

<sup>113</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6，頁808-809，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軍機大臣奏。

<sup>114</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6，頁868，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

<sup>115</sup> 例如，《清國史館奏稿》，冊1，頁256-267，纂修滿、漢文國史列傳均「仿照《金元國語解》對音更正」。

<sup>116</sup> 關於敕纂之間，有不同說法：何冠彪考證認為清代官書的說法均誤，應敕修於乾隆三十六年！見何冠彪，〈論清高宗之重修遼、金、元三史〉，《故宮學術季刊》，12：3，頁62，註26。官書的說法有：乾隆四十六年之說，見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2，頁1277。而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96，頁1，〈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提要〉，寫做「乾隆四十七年，奉敕撰」。「乾隆四十六年與四十七年之說，可能是將先後成書的三史國語解，纂成一書，編入《四庫全書》的時限。持四十六年之說較多。

<sup>117</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11，頁67，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其他書單包括：《皇輿西域圖志》、《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蒙古源流》、《遼》、《金》、《元》三史等。

阿主沙里	ajusali	ejen siri	額珍錫哩	滿洲語，額珍，主也；錫哩，梵語，威也。	同上，卷 10，名物，頁 1。
巴里屯阿懶		bartu aola	巴爾圖敖拉	(蒙古語)，bar-tu ayul-a，有虎山也。	《欽定元史語解》，卷 4，地理，頁 1。
統急里急魯		tenggeri hūra	騰格哩呼喇	(蒙古語)，騰格里，tngri，天也；呼喇，qur-a，雨也。	同上。
八兒胡		barhū	巴喇呼	(蒙古語)，baraqu，完也。	同上。
怯格		cige	齊格	(蒙古語)，čege，馬奶漿也。	同上。
八刺哈黑		baragahan	巴喇噶罕	(蒙古語)，barayaqan，微青色也，河名。	同上，頁 2。

資料說明：1.「順治三年滿譯本」內之空格，因滿文譯本《元史》尚未能蒐集參考，暫缺。2.「釋文大意」裡的蒙古文是本表另外附加的。3.「釋文大意」內有括號(滿洲語)，表示詞源，原《欽定金史語解》因「以滿洲語為本，語解內但釋解義，不複注滿洲語」，本表則仍注明為滿洲語，《欽定元史語解》亦同樣辦理。

## (五)、其他史書的譯改

### 1.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與三史《國語解》的關係甚為密切。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皇帝閱評史著，敕撰《御批歷代通鑑輯覽》，<sup>118</sup>其背景之一，即因見遼、金、元三朝人、地、官名多有謬誤，輾轉失真，又有詮解附會之處，深感不以為然。三十五年(1770)八月，已經開始校對三史《國語解》與《通鑑輯覽》是否有所出入。乾隆皇帝下旨說道：「昨因評纂《通鑑輯覽》，於《遼》、《金》、《元》人地名之訛謬者，悉行改正，復命廷臣重訂金、遼、元《國語解》，將三史內訛誤字樣，另為刊定以示傳信」<sup>119</sup>，每於「摘文評史」之時稽考譯語之誤，也就成為乾隆皇帝的習慣。

### 2. 綱目體史書

這一類史書的訂正工作，尚有於乾隆四十年(1775)奉敕改寫，原修於乾隆四年的《通鑑綱目三編》(《明紀綱目》)，<sup>120</sup>同年五月，進而將連同《明史》內，所有蒙古等人地名查改音譯，交由方略館內原來辦理《國語解》的翰林官員改譯。<sup>121</sup>乾隆四十七年(1782)，所完成的《訂正通鑑

<sup>118</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 2，頁 1318。

<sup>119</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 7，頁 18。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內閣奉上諭，編纂《欽定清漢對音字式》。

<sup>120</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 2，頁 1319。

<sup>121</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 7，頁 881，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五日，大學士奏。

綱目續編》，亦針對義例不正，改訂遼金元三朝史實。<sup>122</sup>

### 3. 《契丹國志》

宋人葉隆禮撰《契丹國志》，原二十七卷，乾隆年間重訂之後，附以卷二十八，題為〈譯改國語解〉，即重新改訂原作的音譯用字，說明語源，但只寫明漢文，不再註滿文拼音，其中有六個詞彙標明為「索倫語」。<sup>123</sup>《遼史拾遺》為清初厲鶚所撰，該書採摭散佚群書，可比於裴松之《三國史注》，卷末附有〈國語志〉，以清廷的觀點來看，卻有「對音舛誤，名義多乖」的缺點，視為附贅，可存而不論。<sup>124</sup>宋人宇文懋昭撰《大金國志》四十卷，重訂之後，附以卷四十一，亦題作〈譯改國語解〉，同樣地說明語源，改正漢字音譯，但不另寫滿文。<sup>125</sup>

### 4. 《蒙古源流》的滿文譯本<sup>126</sup>

上述《欽定元史國語解》的編纂原則，有一項甚為重要，即「姓氏、地名、官名、人名無解義者，俱以《蒙古源流》考今地名、《八旗姓氏通譜》官名，改字面訂之」，《欽定蒙古源流》也成為《欽定元史國語解》的參考用書。漢文本《欽定蒙古源流》內文也理所當然的依照三史《國語解》的原則，譯寫人名、地名，而滿文譯本則非以滿文音寫蒙文，而是把蒙文原本譯成滿文，成為滿洲民族的讀物。

### 5. 金朝、滿洲歷史文獻

宋人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及乾隆四十三年（1778），奉敕纂修之《滿洲源流考》，與金朝有關的史實人地名，均加以譯改。<sup>127</sup>

### 6. 《八旗通志》

除了歷代王朝的史著之外，滿洲自己的民族歷史更不該有語言不通、

<sup>122</sup> 〈欽定訂正通鑑綱目續編〉，《國朝宮史續編》，卷 89，書籍 15，史學 2，頁 868-867。

<sup>123</sup> 《欽定重訂契丹國志》，卷 28，頁 1。六個有標明索倫語的詞彙，例如：「實袞，索倫語日也，原作奚嗚，今改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83，頁 797。此六詞亦見於《欽定遼史語解》。

<sup>124</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 2，〈遼史拾遺二十四卷〉，頁 1274。《遼史拾遺》，卷 23，〈國語解〉，卷 24，〈補國語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89，頁 1072-1084。

<sup>125</sup> 《大金國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83，頁 1057-1065。

<sup>126</sup> 清朝處理《蒙古源流》的過程，參考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導論，頁 43-67。

<sup>127</sup> 據李學智考證，乾隆十二年刻成的《金史·國語解》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滿洲源流考》以及乾隆四十六年敕纂《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各書若干詞彙的解釋有所不同，反映內容一再校改。見李學智，〈金史語解正誤初稿〉，《新亞學報》，5：2（香港：1963），頁 377-429。

文義不明的情況，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十九日，乾隆皇帝上諭表示，針對四庫館進呈《八旗通志》一書內，闕載乾隆年間為褒獎忠烈之恩卹諸政，十分不滿，又前一年所頒漢人、旗人凡有陣亡人員，一體給與世襲之新例亦缺，另外，清初滿洲官稱到乾隆時代已變化甚大，如壯尼大即護軍校，昂邦章京、阿思哈尼哈番之為子男，阿達哈哈番之為輕車都尉等，「雖不便擅改原文，亦當加按注明，或諸朕指示，使後人開卷曉然，方為傳信」。乾隆皇帝為此下旨重纂，萬萬不可「為前史盡心改正，而於本朝反不經意，不幾貽笑將來，傳疑後世」。<sup>128</sup>鑑於《遼》、《金》、《元》三史人地名原文，以當時國語繕寫而為後世修史者不當譯寫，清朝的修史改譯經驗，最後也適用於本朝滿洲歷史著作，也是始料未及。

我們可以從《遼金元三史國語解》的內容發現當時判定詞彙來自於蒙古語的情況相當多，蒙古語源蔚為大宗的情況，反映了「依賴」蒙古的現象。歷史語言的還原是十分艱鉅的工作，乾隆朝考證所得的《遼》、《金》、《元》三史國語音義，成果固然豐碩，雖然也有學者指出其中的缺失，而這些前人考訂的經驗不僅有時代意義，至今仍有不可抹滅的參考價值。<sup>129</sup>

## 五、佛像法名的音寫蒙文

音寫蒙文也可以在《大藏經》的經板上有所發現。清代蒙文《大藏經》十分具有特色，各函以上下夾板保護，上夾板內有精美彩色佛像兩幅，或飾以各色珍寶，下夾板內有五幅彩色佛像，全函共七幅，整套一百零八函全七百五十六幅。上夾板佛像左右兩邊有佛經的名稱及卷數，蒙文《甘珠爾》是左邊蒙文，右邊漢文，而每幅佛像左右兩邊則書寫法名，右邊是蒙文，左邊則是以滿文標寫的蒙文。這說明以滿文音寫蒙文的「現象」，不限於語文的學習，也擴及佛教的傳播，標示滿洲佛教文化之不朽成就。

以滿文拼寫蒙文佛像名稱，不僅便於蒙古讀音，也為滿人學習佛法及大量的滿譯佛經開啓大門。也反映出不是從乾隆朝才大量發揮滿文拼寫蒙文的文化功能，早從康熙朝開始將一百零八函《甘珠爾》的佛像名稱，在蒙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改以滿文拼寫並列，乃成一體。以下以蒙文《甘珠

<sup>128</sup> 〈欽定八旗通志一部〉，《國朝宮史續編》，卷91，書籍17，志乘，頁885-886。

<sup>129</sup> 李學智，〈金史語解正誤初稿〉，《新亞學報》，5：2，頁377-429；金啟琮，《女真語言文字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118-128。

爾》內〈大般若經〉前三卷爲例對照名稱：

表 6-7 蒙文《甘珠爾·大般若經》滿洲字音寫蒙古文佛號對照一覽表

蒙文	音寫蒙文	漢文	備註
šakjamuni	sakjamuni <sup>130</sup>	釋迦牟尼	源自梵文
bilig baramid	bilik baramid	般若	bilig, 蒙文「智慧」
öngge-yin wčir eke	ünggeyin wacir ehe	色金剛天女	öngge, 蒙文「顏色」, eke, 蒙文「母」, wčir 源自梵文
dayun-u wčir eke	dagūnu wacir ehe	聲金剛天女	dayun, 蒙文「聲」
ünür-ün wčir eke	unurun wacir ehe	香金剛天女	ünür, 蒙文「氣味」
amtan-u wčir eke	amtanun wacir ehe	味金剛天女	amtan, 蒙文「味道」
kürteküi-yin wčir eke	hurtekui yin wacir	觸金剛天女	kürteküi, 蒙文「觸覺」。以上第一卷
dibangkar-a	dibangg'ara	燃燈佛	源自梵文
radna daka	radna dag'a	寶空行	源自梵文
bazar daka	bazar dag'a	金剛空行	源自梵文
bazar waranhi	bazar warahi	金剛亥母	源自梵文
badma daka	badma dag'a	蓮花空行	源自梵文
karma daka	g'arama dag'a	羯磨空行	源自梵文。以上第二卷
wčir jirüken	wacir jiruken	金剛藏	jirüken, 蒙文「心」
erdeni gerel yaryayč'i	erdeni gerel gargakci	寶焰佛	蒙文「珍寶發光者」
esrw-a	esruwa	梵天	源自梵文 <sup>131</sup>
qara tayurya-tu	hara dagūrgatu	缺	qara, 蒙文「黑」, tayurya-tu 尚不可解
bing ma ha-a qla	bing mahag'ala	持棍摩訶伽羅	「摩訶伽羅」與「護法」同意, 又多譯做「大黑天」
bingčan ma ha-a qla	bingcan mahag'ala	持挺護法	bingčan, 藏文 ben-chen, 意「大挺」
qurmusta	hūrmusta	帝釋天	qurmusta 與梵、藏文不同, 蒙古民間信仰神。 <sup>132</sup> 以上第三卷

資料出處：《蒙古文《甘珠爾》佛像大全》，上冊，頁 86-121，〈大般若經〉第 1-3 卷，共 12 卷。

資料說明：1. 佛像名稱依每卷（函）上下夾板，自左而右順序排列。2. 「漢文」為《蒙古文《甘珠爾》佛像大全》編者所附加，附加的語文依次為：蒙文轉寫、滿文轉寫、西藏阿禮嘎禮字（以藏文拼寫的梵文）、梵文轉寫、藏文、藏文轉寫、漢文、漢語拼音，共八種。3. 蒙、滿文均有拼寫不規範的現象。4. 本書佛名的蒙文有的是蒙文本字，有的是蒙古阿禮嘎禮字。5. 該書蒙古阿禮嘎禮字轉寫似未規範，本表視情況改寫，故該書不盡相同；滿文轉寫則以 P. G. von Möllendorff 拼音系統。

<sup>130</sup> 另見頁 67、90、151、259 等，滿文有的寫做 šakjamuni。

<sup>131</sup> 梵天，又稱做「因陀羅」，梵文 indra，在蒙古民間信仰裡為諸騰格里天神之一，蒙文又有寫做 esrūn tngri，即「因陀羅騰格里天神」，參見圖齊、海西希著，耿昇譯，《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頁 419。

<sup>132</sup> 蒙古民間宗教的薩滿信仰有三十三尊、九十九尊等騰格里天神的說法，qurmusta 或以 qurmusta tegri，即「霍爾穆斯達騰格里天神」為名出現，為諸騰格里天神之首。此一觀念借鑒於伊朗，後來人們也常把「霍爾穆斯達」與「梵天」相提並論，參見《西藏和蒙古的宗教》，頁 416、417，該書將 qurmusta 拼做 qormusta。

本書法像的蒙文名稱，有的寫以蒙文本字，有的寫以蒙古阿禮嘎禮字，後者是以一種蒙文拼寫藏、梵文的拼音符號。上表的蒙文佛像名稱，有的以蒙文意譯，再加上梵文成分組合而成，如：「色金剛天女」之「*öngge*」意為蒙文「顏色」，「*eke*」意為蒙文「母」，「*wčir*」源自梵文，意為「金剛」；有的以蒙古阿禮嘎禮拼寫梵、藏文，如「燃燈佛」，蒙文「*dibangkar-a*」乃取自梵文，梵文拼做：「*DipaGkara*」。而滿文俱照蒙文改寫，滿文的拼音乃「依附」於蒙古佛教，似未能獨立地與梵、藏語文對音或意譯。或許以滿文拼寫蒙古阿禮嘎禮字其目的只為了表現梵、藏語文的「一般」讀音，而非「精確」的轉寫對照，但是，滿文拼寫蒙文本字則確實使蒙古語音較易通曉。

以滿文拼寫蒙文的佛依法名，也出現在《藏文大藏經》裡面，臺北故宮博物院康熙朝泥金寫本《藏文大藏經》即如此書寫，經板內佛像右邊是藏文，左邊則是以滿文特有的圈點符號音寫的蒙文。如「十一面觀音菩薩像」，左邊以滿文音寫成：「*arban nigen nigūrtu homsim bodisadu*」，<sup>133</sup>其中 *arban nigen* 即蒙文 *arban*（十）*nigen*（一），*nigūrtu* 即蒙文 *niyur*（臉）加上後綴 *tu* 表示「有臉的」。至於 *homsim bodisadu* 乃是沿自《蒙文大藏經》的「觀世音菩薩」的譯名，<sup>134</sup>蒙古文（阿禮嘎禮字）原拼寫做 *qomsim bodhi saduwa*，改以滿文拼寫讀音做 *homsim bodisadu*。<sup>135</sup>

有了蒙文翻譯經咒的基礎及以滿文拼寫蒙文的經驗，在此條件之下，於乾隆十三年，《欽定同文韻統》編成之後，「滿洲阿禮嘎禮」字體亦製作成熟，乃可以此滿文經咒新字來拼寫各種咒語、法名，使得滿文也能把梵咒音義表達精確，滿洲佛教的發展本與蒙古、西藏佛教關係密切，至此而又樹立一新里程碑。

<sup>133</sup> 該佛像引自胡進杉，〈溥心畬觀音圖上的藏文咒〉，《故宮文物月刊》，11：7（127），圖3，頁101。

<sup>134</sup> 以蒙古阿禮嘎禮字拼寫的情況，參見：格·拉西色楞主編，《蒙古文《甘珠爾》佛像大全》，上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頁144，圖45-1「四臂觀音」；頁176，圖55-1「觀世音自在」；頁201，圖63-1、頁258，圖81-2「觀世音」。

<sup>135</sup> 「*bodisadu*」即梵文「菩提薩多」的音譯，即是菩薩。觀世音、觀世音菩薩的蒙文譯法，除 *qomsim bodhi saduwa*，尚有 *ariyabalu*，參見卓日格圖編，《漢藏蒙對照佛教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頁270。據此，*qomsim* 應對譯為觀音、觀世音、觀自在，而其字源尚不清楚。



## 六、會話讀本

(一) 《滿漢會話》<sup>136</sup>

根據所見書影，本書為滿、漢、蒙文對照，音寫蒙文的情況，如：keike akū，漢譯為「不刻薄」，音譯蒙文則寫做 uriguu ugei。

(二) 《三合語錄》<sup>137</sup>

《三合語錄》，為滿、蒙、漢文三體，其中的蒙古亦為音寫蒙文。根據著錄資料所載，此書原為乾隆年間智信所撰，原名《清話百條》（《清文百條》、《一百條》、《清話一百條》），只有滿文本，夾注漢字。<sup>138</sup>據相關書目所著錄，有富俊等人之蒙文翻譯，加入蒙文及漢譯文之後，並將《清話百條》更名為《三合語錄》。<sup>139</sup>此以首頁為例：

漢文：聽見你如今念滿洲書呢，很好，滿洲話是咱們頭等頭要緊的事，就像漢人們各處各處的鄉談一樣。

滿文：donjici. si te manju bithe hūlambi sembi. umesi sain. manju gisun serengge musei ujui uju oyonggo baita. uthai nikasai meni meni ba i gisun i adali.

音寫蒙文：sonoshona. ci odo manju bicik surnai genei. masi sain. manju uge gekci. bidanai eng terigun erkin kerek. darui kitadi yen oru orun gajirain uge adali.

<sup>136</sup> 《遼寧省圖書館滿文古籍綜錄》，版圖，頁214。據編者所介紹，其漢文書名據函套書簽題名而來，並補譯滿文書名：manju nikan gisun i acafi gisurere bithe。另見《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頁113，補譯作《三合詞彙》(ilan hacin hergen i šošohon i bithe.)，並注明該書原著錄名《滿漢會話》。

<sup>137</sup> 《三合語錄》，滿文書名：ilan hacin i hergen kancibuha gisun i bithe；圖版可見盧秀麗、閻向東編著，《遼寧省圖書館滿文古籍綜錄》(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頁206、208。

<sup>138</sup> 《清話百條》，滿文書名：tanggū meyen；圖版參見：《遼寧省圖書館滿文古籍綜錄》，頁205。據奉寬的比較，《清話百條》以不著撰人之《清文指要》(Ma. manju gisun i oyonggo jorin i bithe，與上述富俊所撰者同名異書)為藍本，內容略有雷同，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5，頁527、686；此不著撰人之《清文指要》圖版見《遼寧省圖書館滿文古籍綜錄》，頁178、180。

<sup>139</sup> 《三合語錄》的蒙文譯者，二種版本分別列為富俊，以及巴赫、德勒克，相關館藏及版本見《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頁127-128；《遼寧省圖書館滿文古籍綜錄》，頁206、208，此二圖版示為相同刻本，但卻錄不同的蒙文譯者，箇中原因尚待考察。

(三) 《滿蒙漢三合松窗破悶》<sup>140</sup>

不著撰人，舊鈔硃墨本，成書於乾隆中葉。該書的特色是「滿漢字墨書，傍以朱筆譯注蒙古字，係用滿洲字對音，不書本字，蓋專為易於讀音而設也」，即是以滿文音譯的蒙古字是用硃筆另寫的，可能也是該書鈔寫時之目的。全書一卷，有二十段，<sup>141</sup>內容皆關於「旗籍舊俗」之北京白話對談，各有四言標目。以第一段〈求石磨刀〉為例：

漢文：我帶的小刀子鈍了，現成有磨石，略磨一磨，明日我們隔壁祭祀，請切肉絲。

滿文：mini ashaha huwesi moyo oho. beleni leke bisire be dahame majihe lek eki cimari meni adaki boode wecere yali furumbi seme solihabi.

音寫蒙文：minu jegusen hūtagan mohodak bolba. belen bileku boi yen tulata baha bilegudeya. margata man nu ail gertegen taihū miha kirumui kemen jalaji.

(四) 《滿蒙漢話條二十五段》<sup>142</sup>

不著撰人，舊鈔硃墨本，與上述《滿蒙漢三合松窗破悶》結構相同，時約乾隆中葉。「本書體裁是甲乙對談之北京平話，立論皆通達人情，義主規勸，其篇頁仿舊板滿漢字書格式，分作兩截，上滿下漢，俱墨書，滿洲話旁用朱筆夾寫滿洲字對音之蒙古語」，此音譯的蒙文也是抄寫時所夾寫附加的。全書二十五段，<sup>143</sup>第一段〈勸人溫書〉：

漢文：（甲）讀過的書，若是不溫習，豈不可惜。（乙）可不是什麼，既然這樣說，我自今以後溫習了又溫習，斷然不敢偷懶。

滿文：hūlaha bithe be aika ureburakū oci. hairacuka akūn. waka oci ai. uttu gisurehe be dahame. bi ereci Julesi urebure dade geli urebuki. ainaha

<sup>140</sup> 滿文題名：jakdan fa i ališara tokan，可譯做「以松窗破悶」，亦名：manju monggo ališara tokan，可譯做「滿蒙破悶」，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5，頁542、543。查目前尚未在相關館藏目錄中發現有此書藏本，以下各書亦尚未發現典藏處所。

<sup>141</sup> 各段內容標目：求石磨刀、贊園風水、借人背壺、隆冬大雪、問人減容、冬雪望收、告休艱窘、有能把拈、步甲修道、臘八醃肉、莊頭送煙、怪不赴席、廿三祭灶、買奴得力、問奴脫逃、賣年物料、問辦何物、讓喫蜂模、黏貼對聯、除外拜年等事，共二十段。

<sup>142</sup> 滿文題名：manju monggo nikan gisun orin sunja meyen，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5，頁543、544。

<sup>143</sup> 內容標題有：勸人溫書、話不貫串、雨晴涼熱、實力讀書、心不二用、會見請進、說話害羞、讀書明理等二十五段。

seme gelhun akū banuhūšarakū.

音寫蒙文：dagūdaksan birig ni kerbe bolbasurakūlhū ugei bolbasu. hairalaltai ugeku. mun burugū bolbasu yagū. eimu gelelcegsen yen tulata. bi egunce uruksi. bolbasuragūlhū dere basa bolbasuragūlhūn jagakibacu aisi ugei jalgagūrahū ugei.

(五) 《滿蒙漢話條五十四段》<sup>144</sup>

不著撰人，舊鈔硃墨本，言語、體裁同前，有序言一篇，「書中蒙古語亦係於滿漢行間夾注，用滿洲字對音，硃筆書之」，其第一段如下：

漢文：舊聞阿哥大名，今日不料相見，實在名不虛傳，阿哥若不棄嫌，相交彼此行走，常求指教。

滿文：age i gebu be aifini donjiha. enenggi gūnihakū de acaha. yala gebu algikangge tašan akū. age waliyame gūnirakū oci. gucu arafi ishunde yabuki. jorišara tacibure be kemuni baiki.

音寫蒙文：age yen nere gi kejiyenei sonosba. enedur sanasan ugei du jolagaba. uner nere aldarsanai tasiyan ugei. age gegeji sanahū ugei bolbala. nukur tanigat hamtu yabusai. jigalkihū surgahū ni basaku eriye.

(六) 《滿蒙漢話條七十五段》<sup>145</sup>

不著撰人，舊鈔硃墨本，滿文音譯拼寫的蒙文也用硃筆注寫，「行間蒙古字，係借用滿洲字書寫，取其字有圈點，音讀分明，易於實地交談故，書中各段皆為北京白話，氣脈簡短，不取冗長」。第一段內容如下：

漢文：學滿洲話的人，不在讀的書多少，但在多說，越多說，長的越快。

146

滿文：manju gisun tacire niyalma. hūlaha bithe i labdu komso de akū. damu labdu gisurere de bi. ele labdu gisureci. nonggirengge ele hūdun ombi.

音寫蒙文：manju uge surhū kun. ungsisan bicikun ulumji cuken du ugei. dang

<sup>144</sup>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5，頁295、296。

<sup>145</sup>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5，頁294、295。據提要內容，沒有附寫滿蒙文書名，又「原本標題七十三段，實則七十五段也」，可見此書書名是提要作者奉寬自己所編。提要又寫道「所譯音義兼用外蒙古托忒例，其本字即……（蒙古文）也」，似有誤，觀其書體並非托忒蒙文。

<sup>146</sup> 據提要所言，此段漢文是提要作者所改寫的：「兩越字，上原作益，下原作更，今併改」。

ulemji kelelceku du boi. neng ulemji kelelcebele. nemekuinu neng hūrdun bolnoi.

總之，以滿洲字音寫蒙古語文的作用包括：一、滿洲字早先脫胎於蒙古字又加以改進，後來卻又能反過來影響蒙古語文，音寫蒙古語文就是主要的途徑之一；二、這些音寫蒙文，竟然「看起來」就是滿文了，因此成爲滿洲、蒙古民族的語文教材，甚至是擴大詞彙的基礎；三、產生音寫蒙文的目的固然是滿洲民族學習蒙古語文的產物，而更是要表現滿洲字的拼音、音譯功用，能夠從滿文展開許許多多具有「同文」意義的文化工作，亦即反映滿洲政治文化的特徵。

### 第三節 清代的「同文」理念

#### 一、國史上「同文」現象的流變

「同文」概念幾經流變，秦始皇針對漢字的統一，形成「書同文」的漢字文化圈；元世祖忽必烈則以國師八思巴所創造的八思巴字，譯寫治下的所有民族語言；而本文所要介紹的滿洲字音寫蒙古語文，清代各種語文字書、史書文獻裡常見的「同文」即不同於秦始皇的形式，是一種清代政治文化的特殊現象。清朝統治者也由此展現其「同文之治」、「同文之盛」的姿態，清代的「同文」理念與滿文的音譯功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sup>147</sup>

「同文」，也有學者泛指以漢字記錄本民族語言的現象，在中國有契丹文、女真文，在周邊國家有韓國、日本等，<sup>148</sup>也就是「漢字文化圈」的

<sup>147</sup> 另一相關的課題是「國語」概念的流變，清代的「國語」是指滿洲語文，因此，本文所討論的內容也都是清代「國語」課題的範圍，限於主題暫不做深入討論。至於中國歷史上「國語」，參見 Victor H. Mair, "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 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1994:3), pp. 707-751；清朝「國語」的研究可參考宮崎市定，〈清朝における國語問題の一面〉，《アジア史研究》（東京：同朋舍，昭和 54（1979）），冊 3，頁 333-373。

<sup>148</sup> 參見 Pamela Kyle Crossley, "Stuction and symbol in the role of the Ming-Qing foreign translation bureaus(siyi guan)",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5(1991), pp. 58-59. Pamela Kyle Crossley and Evelyn Rawski, "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3(1993:1), p. 66.後文述敘滿文的歷史，並指出建州女真曾經使用蒙古文和「同文」

成員，或稱做「漢字系文字」。<sup>149</sup>金代的「同文」是指女真族以漢字創造女真文字。而清代的「同文」則不僅在造字上，取法蒙古，不再依附漢字，進一步改變傳統，透過語文翻譯，尤其以滿洲語文的特點體現滿洲政治文化。清代以前也有類似的音譯、音寫方法及文獻，例如：元朝的八思巴字文獻、明代以漢字標記蒙古語文而流傳的《蒙古祕史》及四夷（譯）館記載各民族語文的文獻。

清代也設有四譯館，編輯過《華夷譯語》，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上諭禮部四譯館，仿照「西番書例」（此指西藏），「將字音與字義，用漢文注於本字之下，繕寫進呈，交館勘校，以昭同文盛治」。<sup>150</sup>這裡所指的是禮部四譯館所記錄的國內外文字，仍照前代傳統以漢字注音，雖然保持以漢文注音的前朝傳統，然而，《華夷譯語》並沒有刊刻流通，也沒有續纂工作，其影響力顯然不如官方刊行的語文字書。

「同文館」是晚清時所設立的西學機構，聘以西洋人為教授，學習西方天文、句股、造船、製器諸法。<sup>151</sup>雖然成效不彰，但是也表現了清代著重於翻譯的「同文」概念有延續發展至西學的可能。

## 二、「同文」的比喻

或許以錢幣來比喻，也便於了解清代的「同文」，清代錢法「蓋於錢面鑄年號，以昭王制，於錢幕鑄國書，以示同文」，<sup>152</sup>錢幣上的文字雖不

(t'ung-wen)，即自漢字改造而來的女真文。

<sup>149</sup> 「漢字系文字」包括南方型漢字系文字：壯文、字喃（漢字在越南）、白文（漢字在白族）、苗文、水書、侗文、瑤文、布依文、哈尼文；北方民族類型漢字系，包括表意文字有：西夏文、契丹大字、女真文，表音文字有：日本假名、女書、契丹小字、朝鮮吏讀和訓民正音。參見王鋒，《從漢字到漢字系文字—漢字文化圈文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頁23-213。

<sup>150</sup> 上諭禮部：「朕閱四譯館所存外裔番字諸書，雖分類譯名物，朕所識者，西番一種，已不無訛誤。……既有成編，宜廣為搜輯，加之核正，悉准重考『西番書例』，分門別類，匯為全書。所有西天、西洋各書，於咸安宮就近查辦，其暹羅、百夷、緬甸、八百、回回、高昌等書，著交與該國附近省分之督撫，令其採集補正。此外，如海外諸夷並苗疆等處，有各成書體者，一并訪錄，亦照『西番書例』，將字音與字義用漢文注於本字之下，繕寫進呈，交館勘校，以昭同文之盛治。著傅恒、陳大受、那延泰總理其事」；乾隆十五年七月，四川總督策楞具奏採集轄境諸語，繕寫進呈。參見楊玉良，〈一部尚未刊行的翻譯詞典—清官方敕纂的《華夷譯語》〉，《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4，頁67-69。

<sup>151</sup>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上，〈同文館〉，頁7。

<sup>152</sup>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下，〈本朝錢法源流〉，頁821-822。

同，但是統一由中央發行，即表示同樣的「幣值」，也是「同文」的表現之一。又以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考慮於藏地鑄錢模式的想法，亦見「同文」概念，乾隆皇帝見原進錢模，頗不以爲然：

但閱所進錢模，正面鑄乾隆通寶四字，背面鑄寶藏二字，俱用唐古忒字模印，並無漢字，於同文規制尚為未協。所鑄銀錢，其正面用漢字，鑄乾隆寶藏四字，背面用唐古忒字，亦鑄乾隆寶藏四字，以昭同文而符體制，已另行模繪錢式，發去遵辦。<sup>153</sup>

這裡表示單一語文的形態並不是「同文規制」，而使用二種語言以上才能把意思充分表達。

另外，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皇帝仿漢字三十二篆體，也將滿文〈盛京賦〉以三十二種篆體繕寫，並為各種寶璽、官印的使用，明定用篆形式，重鑄發行，使滿漢文印文篆字同文，正是具有「書同文」意義的創造。<sup>154</sup>

實用可見的「同文」表現，又如：承德避暑山莊「麗正門」門額，「麗正門」滿文寫做：genggiyen tob duka，「麗正門」是乾隆十九年（1754）時，為擴建東部景區時所建，石匾從左到右為：蒙古、回、漢、藏、滿五體。<sup>155</sup>另外，「下馬牌」（Ma. ebubure camhari）上的語文，可謂是最普遍的雙語、多語並列碑文，<sup>156</sup>也成為清廷表現同文的形式。例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己亥，「見在永陵、福陵、昭陵所有下馬木牌，俱改用石碑鐫刻清、漢、蒙古、西番、回子五體字，以昭我國家一統同文之盛。」<sup>157</sup>紫禁城東華門等四門、歷代帝王廟、避暑山莊之麗正門等大門旁下馬碑，則加以托特蒙文，成為六體。

抽象的事例，如：語音。《同文韻統》是乾隆朝第一部具有創新立意的對音字書，為了使滿漢文字能更精確表達佛教梵音咒語，協合聲韻而編

<sup>153</sup>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上命軍機處傳諭福康安等事，收入《欽定廓爾喀紀略》，卷47，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冊3，頁795。

<sup>154</sup> 參見林士鉉，〈契約文書中的滿漢合璧印章：以《宜蘭古文書》為例〉，《政大史粹》，第四期（臺北，2002），頁1-20。

<sup>155</sup> 趙玲、牛伯忱，《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頁13。

<sup>156</sup> 如：台南孔廟「下馬牌」：「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Ma. bithe coohai hafasa cooha irgen iurse ubade jifi morin ci ebu），北京歷代帝王廟「下馬牌」：「官員人等至此下馬」（Ma. geren hafan irgen uba de morin ci ebu）。

<sup>157</sup> 王先謙，《東華續錄》，收入《十二朝東華錄》（臺北：文海出版社，民52（1963）），卷37，頁1355。

纂。<sup>158</sup>《大藏全咒》、滿文《大藏經》的翻譯目標也在於「闡教同文之義」。

《同文韻統》等典籍雖是為佛教文化而做的字書，尤其發揮滿文的拼音功能，其影響所及可謂遍於乾隆朝所有語文工作，而以各民族各異之文字來拼寫咒語不變的本音，正是「同文」。滿文對音規則也是現代語音學家研究清初北方音系的重要資料。<sup>159</sup>《西域同文志》序文也闡釋說：

同文云者，仍闡《韻統》之義，而特加以各部方言，用明西域紀載之實，期家喻戶曉，而無魚魯毫釐之失焉。然嘗思之，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謂實也，至於文，蓋其名耳，實無不同，文則或有殊矣，……漢人以為天而敬之，回人以為阿思滿而敬之，是即其大同也。實既同，名亦無不同焉。達者契淵源於一是，昧者滯名象於紛殊。<sup>160</sup>

人之根本在於真實義理，而文字只是「名象」，不同種族的語言文字只是「名」的不同，均可載道，道理之實則無不同。這裡也提到「同文」是根據成書於乾隆十五年（1750）《同文韻統》的宗旨，而進一步闡釋，因此，《同文韻統》的「同文」闡釋確有其根本的立命。

此外，「同文」的概念也引伸至新得疆域的歸屬，統一由中央測量經緯度，載之圖籍。乾隆二十一年（1756），討平厄魯特準噶爾蒙古，乾隆皇帝在〈丙子春帖子〉一詩中，特別記下收將厄魯特收入版圖後，所做的「同文」之舉。其中「訛正從前珠露海」之詩注：

蒙古推步家，謂之珠露海，準噶爾舊有之，茲以歸我版圖，命何國宗等，挈儀器往測晷度，注之憲書，以示同文。<sup>161</sup>

詩注中的「推步」是指推算天文曆法之學，「推步家」便是此學的學者。乾隆皇帝認為：蒙古語把推步家稱做「珠露海」，<sup>162</sup>也就是說準噶爾蒙古

<sup>158</sup> 《欽定同文韻統》（臺北：新文豐出版社，民 67（1978）），6 卷，乾隆十三年敕修。

<sup>159</sup> 林慶勳，〈刻本《圓音正考》所反映的音韻現象〉，《聲韻論叢》，第三輯（臺北：學生書局，1996），頁 149-203；黃俊泰，〈滿文對音規則及其所反映的清初北音音系〉，《國文學報》，1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民 76（1987）），頁 83-118；吳聖雄，〈《同文韻統》所反映的近代北方官話音〉，《國文學報》，15（臺北，民 75（1986）），頁 299-326。後文主要從《同文韻統》裡的漢藏對音來探討十八世紀北方官話音。

<sup>160</sup> 《欽定西域同文志·御製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5，頁 1-2。

<sup>161</sup> 〈丙子春帖子〉：「歲紀重開子，星杓又指寅，天涯息征戰，歌舞太平春，烏孫歸去各封汗，協紀明時命五官，訛正從前珠露海，條風翹首向東看」，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十全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卷 6，頁 47。

<sup>162</sup> 「珠露海」是由蒙文：jiruqai，直接音譯而來，蒙文意為：占星、卦象、曆法，即「推步」，而「推步家」的蒙文應寫做：jiruqaiči，漢字音譯或可寫做：「珠露海齊」。

有自己的天文曆法之學，但是該部族領地在歸入清朝之後，有必要由中央派員重新測量，使全國有統一的時憲曆法，乃至於經緯標準，這種把蒙古舊有的曆法、經緯重新測量，載入圖籍，頒示中外的行動，也是「同文」的表現。乾隆二十五年（1760）春，關於朝廷派欽天監官往測日影，釐定時憲、節氣的措施，又有以下的形容：「嚕斯訥默會文同，測景詳求昏旦中，從此凹睛凸鼻輩，一齊吏驗東風」，所謂「嚕斯訥默」是回部有相沿的「占候書」之名；乾隆二十三年（1758），布魯特人來朝至避暑山莊覲見，乾隆皇帝也表示：「娑夷、鄂畚同文軌」，<sup>163</sup>這也都展現了想要對「西方」屬國推展「同文」的企圖。總之，乾隆時代君臣對「同文」相當重視，處處有所表現。<sup>164</sup>

「同文」的具體表現主要是經由翻譯對照，朝廷不但設立多種語文的官學、舉辦「翻譯科考試」，尤其編纂多部語文字書，反映了清朝官方對翻譯工作極為重視。滿洲統治者對滿文字彙理解與翻譯都反映在「清文鑑系列」的編纂工作，清代官方對《御製增訂清文鑑》的評價與定位：「新定國語增入者，尤為詳備，於以昭示來茲，為萬萬世同文之準」，<sup>165</sup>此所謂「同文之準」，即是以《御製增訂清文鑑》的字義解釋做為滿文翻譯用字的準繩。雖然各種民族語文都有自己的表達特色，多語文合璧形式也不一定是文義完全相同的對譯，而這是屬於文獻形成與解讀的問題，若以溝通為目的、以對譯為形式的合璧、翻譯，則應當力求準確。

### 三、滿文的「同文」一詞

清代人士對「同文」有過一些解譯，例如：富俊所撰《蒙古托忒字彙》，其序文首先說明：「稽古六書之作，原有諧聲、假借、轉注諸法，而其義要歸於同，故曰同文」，<sup>166</sup>其中「同文」滿文對譯做：*hergen*（字）*emu*（一）。富俊想表達漢字的六書造字法，其中諧聲、假借、轉注都是和聲

<sup>163</sup>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 12，頁 147，〈九月廿五日進宮之作〉，娑夷是布魯特地名，鄂畚是哈薩克地名。

<sup>164</sup> 例如：《御製詩三集》，卷 72，頁 2，〈詠痕都斯坦玉墨瓶筆室〉：「非珍新新兼精玖，用識同文異散荊」；《御製詩五集》，卷 51，頁 36，〈八徵耄念之寶聯句〉，劉墉之句：「同文所識云石感」

<sup>165</sup> 《御製增訂清文鑑·提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2，頁 1-2。

<sup>166</sup> 《蒙古托忒字彙》，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藍晒本。滿文轉寫：*julgei ninggun hacin i hergen be banjibuha be kimcici. daci mudan acabure gūnin gaire forgošome gamare jergi arga bi. terei jurgan oci gemu emu adali. tuttu hergen emu shebi.*。



音有關，也是漢字最主要的來源，這種以聲造字的道理是相同的，所以「同文」。其他如「古者六書，諧聲居一」的說法，也是同義，<sup>167</sup>對於以六書造字的看法大體相同。聲音、語言既然是六書造字法最大的字彙來源，清代滿洲民族似乎頗能把握此重點，輔以滿洲字來就是拼音文字，以滿洲文字來「形聲造字」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幾乎所有的「同文」二字，滿文翻譯都是：*hergen emu*。清代官書以「同文」為名的有二部：其一是《同文韻統》，滿文書名可寫做：*hergen be emu obume mudan be uheri acabuha sere gebungge bithe*，<sup>168</sup> 其二是《西域同文志》，滿文書名為：*wargi aiman i hergen be emu obume ejetun bithe*，<sup>169</sup>題名的「同文」均是譯做：*hergen*（字） *be*（把） *emu*（一） *obume*（成爲）。<sup>170</sup>因此，*hergen emu* 應可以看做是一種縮寫的表現。

那麼「同文之治」呢？乾隆皇帝在《御製滿蒙文鑑·御製序》首先提到：「古聖王以三種掌造字之法，《周禮》記載費氏通四方所管之文字。自此觀之，同文之治，所教唯六種做式，全備七種者獨無」。<sup>171</sup>據此，所謂「三種」造字法，或許是和聲音有關的諧聲、轉注、假借，這裡也是肯定六書造字的是不能再超越的，不可能有第七種造字的方法。這裡所說的「同文之治」是由滿文：「*bithe*（書） *i*（的） *emu*（一） *obure*（成爲的） *dasan*（治）」翻譯而來；另外，在康熙五十六年成書的《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其翻譯臣工序文也提到：「唯願者，千百國之同文，政咸望」，<sup>172</sup>其中「同文」滿文也寫做：「*bithe be emu obuha*」，所謂的「文」

<sup>167</sup> 〈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字譜說〉，《同文韻統》，頁 77。

<sup>168</sup> 據〈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序〉，《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頁 11，「咒堂準前輯《同文韻統》例」之滿文。

<sup>169</sup> 據安雙城主編，《滿漢大辭典》（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頁 1082，「西域同文志館」一條。另可參考《御製三合切音清文鑑·御製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4，頁 9，「欽定西域同文志」滿文則寫做：*wargi ba i hergen be emu obuha ejetun i bithe*，二者用字稍有出入，而「同文」的滿文寫法則一致。

<sup>170</sup> 與「同文」相近的書名還有《一統志》，但是就滿文來看字義完全不同，《一統志》滿文寫做：*uherileme ejehe bithe*，意為「全部記載的書」，*uherilembi* 有統共、統一、合併，統合起來的意思。

<sup>171</sup> 《御製滿蒙文鑑·御製序》，乾隆八年四月十一日，滿文及音寫蒙文合璧。該段滿文轉寫：*julgei enduringge wang se. hergen dasara kooli be ilan hacin i dambuhabi. jeo lii bithede. fi ši hafan duin dere de hafumbure bithe hergen be kadalhaba seme arahabi. ereni tuwaci. bithe i emu obure dasan. damu ninggun hacin i arara durun be tacibufi. nadan be yongkiyabure teile akū.*

<sup>172</sup> 《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翻譯臣工序》，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收入《御製滿蒙文鑑》，頁 8。該句滿文轉寫：*damu buyerengge tanggū minggan gurun i bithe be emu obuha. dasan be uhei hargašakino.*

也是以「書，bithe」來表示。因此，漢譯做「同文之治」的「文」，滿文字面本意是「書，bithe」，而不是「字，hergen」。「同文之治」滿文譯做：「bithe i emu obure dasan」，似乎得考慮滿文對「書，bithe」以及「字，hergen」的解釋。<sup>173</sup>

漢字的書、文，都有文字之意。康熙朝《御製清文鑑》把「書、bithe」解做：「經、史、諸子百家著作，稱之書，又寫的字，也稱之書」，<sup>174</sup>所以，滿文的「書，bithe」和「字，hergen」也是可通用的。至於「字，hergen」的解釋，康熙、乾隆時代二種《清文鑑》的解釋重點不同。康熙朝《御製清文鑑》解做：「把凡是所寫的書，稱做書的字」，<sup>175</sup>這裡的「書的字」應就是漢文的「文字」，除了表示語言的符號，文書、文章也叫文字；《御製增訂清文鑑》對「字，hergen」解做：「凡滿洲、蒙古、漢人、外國各地之語言，以各種樣式的字畫書寫，皆稱為字」，<sup>176</sup>此解釋著重於字、文字，是語言的符號。

至於漢文「同文」的「文」，滿文的解釋也值得參考。「文，*šu*」，《御製清文鑑》解做：「通曉之人稱文，又和文章有關，光華之意，又和天文地理有關」；<sup>177</sup>《御製增訂清文鑑》的解釋則重點不同，較為直捷：「書（bithe）之理（*giyan*）稱之文」<sup>178</sup>，因此，書、字都是工具、載體，而「文」的內涵在於「理」，此「理」是「合於禮、義之處」，<sup>179</sup>與教化相洽合。此外，清初也有一本名為《滿漢同文全書》的滿漢對照字書，<sup>180</sup>該書序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滿文題名做：manju（滿洲） nikan（漢）

<sup>173</sup> 與滿文 bithe，書，相近的字還有 nomun，此字由蒙古文 mon 而來，對譯於佛經、《五經》的「經」；早期的滿文也直接音譯漢文，寫做 ging。

<sup>174</sup> 引自《御製滿蒙文鑑》，頁 156，滿文轉寫：ging suduri. geren dz tanggū booi banjibuha arahangge be. gemu bithe sembi. jai araha hergen be. inu bithe sembi.。另見乾隆朝《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7，頁 24，則沒有把「所寫的字也稱書」列入。

<sup>175</sup> 引自《御製滿蒙文鑑》，頁 160，滿文轉寫：yaya araha bithe be bithei hergen sembi.。

<sup>176</sup> 《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7，頁 44，滿文轉寫：yaya manju mogggo nikan tulergi gurun meimeni ba i gisun banjibume hacingga durun i jijume arahangge be gemu hergen sembi.。

<sup>177</sup> 引自《御製滿蒙文鑑》，頁 165，滿文轉寫：hafuka niyalma be šu sembi. geli šu yangse holbofi gisurembi eldengge saikan sere gūnin. geli abkai šu nai giyan seme holbofi gisurembi.。

<sup>178</sup> 《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7，頁 50，滿文轉寫：bithei giyan be šu sembi.。

<sup>179</sup> 滿文「理，giyan」，引自《御製滿蒙文鑑》，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 720，頁 324，滿文轉寫：doro jurgan i lak seme acanara babe giyan sembi.，漢譯做：禮、義恰合之處稱之理；《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11，頁 46，滿文轉寫：doro jurgan i acanara babe giyan sembi.，漢譯做：禮、義所合之處稱之理。

<sup>180</sup> 《滿漢同文全書》，參見《遼寧省圖書館滿文古籍圖書綜錄》，頁 96-97；《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冊 5，頁 682-683。

i (的) šu (文) adali (相同) yooni (全) bithe (書)，「同文」對譯做「šū adali」，以「šū」對譯於「文」，滿文明顯是直譯於漢文，也是合理的現象。

總之，綜合以上滿、漢文對「同文」的解釋，即是要說明語言、文字、書籍和「理」的關係。<sup>181</sup>《御製三合切音清文鑑》，是一部標舉滿蒙漢三語相互切音、對音的字書，乾隆皇帝的序文提到自己從民族語言的學習心得：「因悟天下之語萬殊，天下之理則一，無不戴天而履地，無不是是而非非，無不尊君上而孝父母，無不賢賢人而惡小人」，<sup>182</sup>這便是為「同文」所的最好的詮釋了。

#### 四、「同文」與滿洲政治文化

「同文」一詞自秦朝以來就理解做「書同文」，統一文字，以相同的文字書寫，因此，「同文」也成為政治文化特徵之一。

清代滿洲統治者是否有統一民族文字的想法？筆者從清代文獻裡尚未發現具體事例。乾隆皇帝提到和清朝有交通往來的各部落屬國時，認為「彼等各地方之語音殊異，文字不同，中國之滿洲漢人書同文之治，取改未成，是故設立理藩院，特管辦彼等之事」，<sup>183</sup>即表示把滿漢等書籍文字統一之事並不可行，是故清朝的作法是責成理藩院辦理民族語文的翻譯需求。

再者，將漢文等典籍翻譯成滿文的作法，或許會被當時的人認為此舉是想要以滿文為中心，針對此疑慮，乾隆皇帝也做了說明，以滿文《大藏經》的翻譯工作為例，「以漢譯國語，俾中外胥習國語，即不解佛之第一義諦，而皆知尊君親上，去惡從善，不亦可乎！」<sup>184</sup>滿洲語文固然是具有「國語」的地位，但即使是滿文《大藏經》的翻譯，乃為了符合「闡教同

<sup>181</sup> 「同文」之「理」的觀點與清代「理學」的關係，有待進一步申論，本文暫略。

<sup>182</sup> 《御製三合切音清文鑑·御製序》，滿蒙漢合璧，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一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4，頁 7-8。

<sup>183</sup> 《御製滿蒙文鑑》，序 3，乾隆八年四月十一日，滿文轉寫：ese meni meni ba na i gisun mudan encu. bithe hergen adali akū. dulimbai gurun i manju nikan bithe i emu obure dasan be jafafi dasame banjinarakū ofi. tuttu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libufi. ceni baita be cohatoi kadalame icihiyamuha.。

<sup>184</sup> 滿文《大藏經·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之義」，<sup>185</sup>即還是以推廣文教義理為目標，並不是為了「服務」滿文。

清代官方的「同文」言論除了出現在和民族語文相關的著作以外，在《康熙字典》裡等漢文典籍、著作裡，我們也可見到其彰顯「同文之治」的目的，正在於長久以來語文之字形、方言雖異，而文字、讀音所要傳達的核心義理才是不變而應當把握的。《康熙字典》御製序文略謂：

朕每念經傳至博，音義繁賾，據一人之見，守一家之說，未必能會通罔缺也。爰命儒臣，悉取舊籍，次第排纂，切音解義，一本說文、玉篇，兼用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其餘字書，一音一義之可採者，靡有遺逸。至諸書引證未備者，則自經、史、百子以及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詩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羅博證，使有依據。然後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一音之不備矣。凡五閱歲而其書始成，命曰字典，於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學稽古者，得以備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sup>186</sup>

以上特別指出，字形方言的流變雖有不同，而文字的本義則相同，因此《康熙字典》的編纂工作是能夠有助於徹底了解音義究竟的「德治」，而這即是「同文之治」。

然而，《康熙字典》是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五年（1711-1716）之間，編纂漢文字典，而早從康熙十二年（1673）起即著手編纂滿文單語字典，即康熙四十七年成書的《御製清文鑑》，早於《康熙字典》，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六年（1710-1717）之間，又以蒙文對譯編成《御製滿蒙合璧清文鑑》，是故滿蒙漢的字典的編纂工作可謂同時進行。

由此可知，清代「同文」的觀念反映了滿洲政治文化兼通融合的特徵，不論是漢文或其他民族語文，雖形象不同，也不論是儒家或佛教，其文教義理的本質無不同，是故在內地與邊疆同樣推動文教並無矛盾。

從滿文的拼音功能所表現出的滿洲文化意識十分顯著，滿文的使用不僅是滿人的民族語文，透過滿文的功能來顯現其文化地位，才是滿文與滿洲文化意識的關聯。〈御製同文韻統序〉提到：

粵自切韻字母之學，興於西域，流傳中土，遂轉梵為華，而中華之字不特與西域音韻攸殊，即用切韻之法，比類呼之，音亦不備，於

<sup>185</sup> 見《乾隆朝上諭檔》，冊7，頁282，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日。

<sup>186</sup> 《國朝宮史》，卷31，書籍10，字學，〈康熙字典一部〉，頁605。

是有反切，有轉注，甚至有音無字，則為之空圈影附，其言浩若河漢，而緒紛如亂絲。我國朝以十二字頭，括宇宙之大文，用合聲切字，而字無遁音。華言之所未備者，合聲無不悉具，亦無不吻合，信乎同文之極則矣。<sup>187</sup>

這裡即是要說明，佛教傳入中土已千年，長久以來「中華之字」卻不能將梵音表達清楚，而滿文則可以。乾隆皇帝對滿文的載道與翻譯功能充滿自信，滿文還有助於梵音漢字的審訂，「天竺之字皆與國書字頭音韻相符，用合聲法對書，漢字皆可得其本韻，以此音譯梵言，庶幾其吻合矣」。<sup>188</sup>〈國書為華梵字母權衡說〉一篇可謂充分說明滿文對「梵華」字音溝通的功能，略謂：

故準國書以定字母之權衡而後審音者，旁通而無闕，標梵字而注，以漢文之反切而後讀是書者，知義類之各有所歸。至於十二字頭之專行，大藏經咒之重訂，其離合同異之故，固與此書互相發明，而無抵牾也歟。<sup>189</sup>

這裡是說，滿文可做為華梵字母對音的樞紐與標準，滿文可標注梵音，漢字可據滿文切音，只要審訂出正確的聲韻用字，透過漢字切音系統，也可以推知梵字。傳統上的滿文、滿洲字所用的「十二字頭」字母，其讀音、寫法與重訂大藏經咒所用的滿洲阿禮嘎禮字是有些不同，這是因為滿洲阿禮嘎禮字是用和西藏阿禮嘎哩字對照，一起對音於梵音的，即一般滿文字母在滿洲阿禮嘎禮系統裡有別於傳統的讀法，所以說二者是「離合同異」。<sup>190</sup>所以，通過滿文所展現出的翻譯規模，可臻至「同文之極則」的境界。清朝官方對《同文韻統》的評價也歸結到翻譯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故古所重譯而不通者，今一展卷而心契，聲聞韻通，歌頌同文之盛，真亙古之所無矣」。<sup>191</sup>

<sup>187</sup> 《同文韻統》，頁3-4。

<sup>188</sup> 〈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字譜後說〉，《同文韻統》，159-168。

<sup>189</sup> 〈國書為華梵字母權衡說〉，《同文韻統》，169-179。

<sup>190</sup> 滿文十二字頭字母與滿洲阿禮嘎禮字的關係，〈國書為華梵字母權衡說〉略有說明：「至於配合圖譜，其切音韻之字（即滿洲阿禮嘎禮字），一從梵書體例，不強與國書相同，如西番之嘎伊為基，國書之基伊為基，則從西番之嘎伊；國書之訥額為訥，西番之納厄為訥，則從西番之納厄。……其讀法皆與國書異，則亦各從其音韻，別為書法（即阿禮嘎禮字法），以為注之。蓋梵書藉國書而明，非藉梵書以明國書也」。《同文韻統》，頁175-177。參見：Giovanni Stary, "An unkno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Manchu writing: the Indian Letters(tianzhu zi 天竺字)",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8:2(2004), pp. 280-291.；亦參見第四章第四節。

<sup>191</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1，卷42，經部42，小學類3，《欽定同文韻統，六卷》，頁1138。

多種語文合璧形式，雖然不同語文定有其表達特色，也不一定是文義絕對相同的對譯，值得注意者，由滿文所投射的文化心態更進一步使滿洲文化與上古三代歷史文化相連結：

惟我國書十二字頭，用合聲相切，緩讀則為二字，急讀則為一音，悉本乎人聲之自然。證以左傳之丁寧為鉦、句瀆為谷，國語之勃鞞為披，戰國策之勃蘇為胥，於三代古法，亦復相協。<sup>192</sup>

在標舉大同與一統的時代，翻譯用字應合體例，力求精確，才符合「車書大同」的理想。因此，基於翻譯的精確，乾隆皇帝不斷地對檢查譯語，因而有《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的編纂及相關史學的譯改，編纂《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即是一例，前引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月二十九日，上諭編纂《欽定清漢對音字式》，乾隆皇帝指出漢字對音的不合宜之嚴重弊端。此後，他不僅要求漢譯的準確，也要求滿文譯文合乎精確體例。

滿文雖不能似漢文表達平上去入四聲，也有別的方法來使滿文譯文與漢文原文體例相同。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九日，內閣奉上諭：

向來清字譯漢對音，其漢字有平上去入四聲，而清文之字本少，是以不拘平仄，僅仿六書假借之意，通融對譯。昨朕偶閱《繙譯通鑑輯覽》內，如衛與魏，清字通用一某字，但衛與魏原有輕重二音，衛字應從輕呼，魏字應從重呼，清文衛與魏亦有輕重之分，是以於書內分別改正即如漢字。凡係尊稱者，不加點，而罕、漢等字則加點以別之。專之與傳亦然，以此類推。如兩字而音有輕重可分者，即從衛、魏之例，其止一字之音，難以分寫者，則於本字左右上下，照罕、傳等字加點，以昭區別，即不能盡如漢字之按四聲發圈，而於音韻不至相混，亦可以補對音所未及，散交繙書房大臣詳悉妥議具奏，候朕審定刊刻成書，用彰同文之盛，欽此。<sup>193</sup>

由上可知，《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已經頒刻後，仍不斷規範滿漢文對音，於滿文對音漢字的拼法，仔細要求，漢字可分輕重音者，如衛、魏，滿文則可以母音 ū 與 u 來區別，漢文同音者有尊稱與否的差別，如：專、傳，罕、漢等字，滿文則對尊稱者不加「點」。總之，唯有不斷改革，提昇翻譯品質，方能「用彰同文之盛」。<sup>194</sup>

<sup>192</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1，卷42，經部42，小學類3，《欽定音韻闡微，十八卷》頁1136。

<sup>193</sup> 《乾隆朝上諭檔》，冊7，頁497，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

<sup>194</sup> 這裡的上諭說明有些錯誤，「衛字應從輕呼，魏字應從重呼」是有問題的，「衛」應是重呼，即入聲字，而「魏」應是輕呼，平聲字，據《欽定清漢對音字式》，第二字頭，頁10，「ui，

上述各種字書纂輯以及譯改史著成果甚多，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御製增訂清文鑑》告竣之前，也逐步進行《通鑑輯覽》、《金元國語解》、《西域同文志》等校訂音義的編纂工作。這些工作都有一個共同的宗旨，即是針對翻譯的問題而發揮。〈御製增訂清文鑑序〉有言：

稽古語言文字之傳，不能不隨方隨時，代為變易。將欲觀其會通，惟音義兩端為之樞筌，獨是施之於繙譯，則以字之不得其音而舛者，亦以字之強索其義而逾舛。<sup>195</sup>

這裡強調翻譯做漢文時，尤應避免「穿鑿字法，謬寓褒譏，曲解方言，傳會漢語，一切務求勝」。<sup>196</sup>因此，譯做漢文時，如何遣詞用字可以說一直是此類工作的核心。

在蒙古等地推行文教的文化政策，也是編纂字書、音寫蒙文的目的，是蒙古族學習滿文、編纂字書推行語文翻譯的工具書，又如《御製滿蒙文鑑》所附翻譯臣工之序言：

再蒙古語文，因各部皆可通，從此別部異域、不耕不織、唯務打牲畜牧之人，皆漸浸滲文教，尚持文史，淨易粗鄙，共導於同文之治，雖史冊所記古代至太平之世，唯四海之內彰顯文治，若譬於軍隊全退之運，實絕古超群矣。<sup>197</sup>

因此，「同文之治」的現象也是就清朝推廣文教不分中外而言，這裡針對各部蒙古製作滿蒙合璧字書，使在文教上的滿蒙一體得以推行，清朝自許這是滿洲文化上接三代，而又超越三代的創新成果。清代官方對《欽定蒙古源流》的評價即說：「仰惟我國家萬方同軌，中外嚮風，蒙古諸部久為臣僕，乃得以其流傳祕冊，充外史之儲藏，用以參考舊文，盡卻耳食沿訛

魏、偉，俱平聲讀」，「ūi，胃，入聲讀」。又參考（清）恩裕，《音韻逢源》，序於道光二十年，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258，頁 734、735。《音韻逢源》雖區別了漢字的輕重音，而體例上沒有區別滿文母音的 u 和 ū，可能恩裕對滿漢對音的看法不同。

<sup>195</sup> 參見〈御製增訂清文鑑序〉，該序文附於〈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序〉之後，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4，頁 12-20。

<sup>196</sup> 〈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4，頁 2-3。

<sup>197</sup> 《御製滿蒙文鑑·翻譯臣工序》，乾隆八年四月十九日，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袖珍精寫本，滿文轉寫做：jai monggo bithe gisun. geren aiman gurun de gemu hafunaci ojoro be dahame. ereci encu gurun lakcha jecen tarirakū jodorakū damu buthašame abalame. ulha fusebume nukteme banjire urse gemu ulhiyen i šu i tacihyan de yumbume singgebufi kemuni bithe suduri be jafašame. muwa albatu geterembume halafi. bithe be emu obuha dasan de uhei wenbumbidere. suduri dangse de ejeme araha julgei ten i taifin jalan sehe seme. damu duin mederi dorgi šu i dasa iletuleme eldefi cooha dain fuhai nakaha sere forgon de duibuleci. yargiyan i lakcafi colgorokobi kai.

之漏，一統同文之盛治，洵亙古獨隆矣。」<sup>198</sup>《欽定八旗通志》對於義理、滿文、同文、文化道統之間的關係，做了最佳的說明：「或因經義以通國書，而同文之聖化被於四方，或因國書以通經義，而明道之遺編彰於萬世」。<sup>199</sup>

「同文」的工作，除了表現在翻譯，也表現在滿文檔案文獻的整理，即是以新滿文將老滿文「改頭換面」一番。乾隆三十九年（1774），將乾隆六年（1741）整理裝裱三十七冊入關前的滿文「原檔」，又於三十九年開始照寫，隨即於四十年（1775）「另行音出一分」，即以通行的新滿文音寫，二者同時進呈御覽。<sup>200</sup>反映了以滿洲字音寫的方法，不止使用於其他民族語言，也擴及到通用的滿洲字的前身、與蒙古文關係密切的「老滿文」，即無圈點滿文。

<sup>198</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2，史部7，雜史類，《蒙古源流，八卷》，頁1422。

<sup>199</sup> 《欽定八旗通志》，卷120，頁6。

<sup>200</sup> 關於乾隆朝整理滿文「老檔」的記載，參見莊吉發，〈文獻足徵－《滿文原檔》與清史研究〉，《清史論集》，第一輯，頁42-56；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頁85-90。乾隆朝廷整理的三十七冊，即後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舊滿洲檔》的部分內容。喬治忠根據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國史館檔》，指出在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以無圈點老滿文字體照錄老滿文的工作已開始。至於「照寫」與「音寫」進呈的情況，另參見《清國史館奏稿》，冊1，頁403。



圖 6-1 《御製滿蒙文鑒》，卷 1，天部，天文類，頁 1-2。

圖 6-2 《滿蒙漢三體字書》，〈蒙文十二字頭的疑問語氣〉

圖 6-3 《欽定西域同文志》，卷 1，頁 1-2。

圖 6-4 《大藏全咒》，目錄，卷 1，頁 1-2。